

# 美国史研究通讯

The China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2010 年第 1 期

(总第 104 期)

主 编：王 旭

副 主 编：胡锦涛 韩 宇

责任编辑：胡锦涛 杨长云

校 对：徐 菲 付启梦

出 版 者：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出 版 地：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0 年 9 月 1 日

本通讯的内容亦刊登于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

[www.ahrac.com](http://www.ahrac.com)

# 目 录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报道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韩 宇 王 洋 (1)  
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续).....王 旭 (8)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一届理事会通报..... (15)  
贺信.....刘绪贻等 (16)  
理事简介..... (18)  
本次理事会换届工作的一点感想.....王 旭 (26)  
如何开好年会的一些建议.....王 希 (28)

## 庆贺黄绍湘顾问九十五寿辰

- 绚丽多彩的人生——访中国美国史奠基人黄绍湘先生.....顾 宁 (29)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等致黄绍湘顾问的贺信..... (37)

## 庆贺齐文颖顾问八十寿辰

- 我会会员在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聚会上的发言.....李剑鸣等 (38)  
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漫谈.....齐文颖 (47)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等致齐文颖顾问的贺信..... (51)

## 书评

- 评《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张聚国 (52)

## 学术动态

- 我会多名会员获得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秘书处 (56)  
华庆昭先生谈资料收集.....孙 洁 (56)  
华庆昭先生在南开大学讲学.....宋 丹 (59)  
康奈尔大学陈兼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学.....乌兰等 (59)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在南开大学讲学.....贺建涛、张献华 (61)  
美国驻上海世博会总代表费乐友先生访问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李文硕 (62)

## 会员动态

- 李剑鸣教授入选 2009 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63)  
王立新教授入选 2009 年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 (63)  
方生顾问向秘书处赠送图书..... (63)  
任东来教授在埃默里大学访问..... (64)  
高春常教授在南卡罗来纳大学访学..... (64)  
李莉博士获厦门大学教学竞赛特等奖..... (65)

## 新书讯

- 秘书处近期工作..... (75)

## 编后记

- ..... (77)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综述

韩宇 王洋

2010年4月23日至26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本届年会开幕式由副理事长任东来教授主持，承办单位厦门大学校领导白锡能教授和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致欢迎词。我会顾问黄柯可研究员致词，她勉励会员继承老一辈会员的开拓创新精神，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开幕式上，理事长李剑鸣教授致开幕词并做主旨报告发言，对近年来的中国美国史研究进行了回顾，我会秘书长王旭教授做了理事会工作报告。

本届年会进行了理事会的换届工作，经选举产生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一届理事会，厦门大学王旭教授当选为理事长，副理事长（按姓氏笔划为序）为山东师范大学王玮教授、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庆龙研究员（法人代表）、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会议决定研究会秘书处继续设在厦门大学，厦门大学韩宇副教授为秘书长，副秘书长为厦门大学胡锦涛副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高国荣副研究员。会议期间 CINFO-现代信息公司派代表到会，对其网络资源进行了介绍，为美国史研究在网络资源的使用方面提供了便利。

来自国内6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的13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共提交论文113篇，涉及美国早期史、外交史、城市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社会史及史学史、网络资源与教学等很多领域。不仅参加人数和提交论文的数量创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历届年会之最，而且，论文的学术质量有明显提高，充分显示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最新面貌。

### 一、美国早期史

美国早期史是我国美国史研究一个迅速成长的领域。本届年会上有三篇文章论及美国国家构建的理念和实践。美国建国历程中，古典传统发挥的作用在学术界存有争议，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对此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指出，美国的建国者对古典知识采取了一种实用的态度，把它置于他们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资源中，并结合他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加以综合利用，既未彻底抛弃雅典民主的精神理念，也没有完全认同罗马共和的制度安排，而是借助自己的政治智慧和现实关怀对两者进行了改造和转化，最终超越了古典传统，确立了一种新型政体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建国之初，关于国家构建的理念之争不绝于耳，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梁红光介绍了美国建国初期政治家埃德蒙·伦道夫的联邦制理念及其发挥的重要作用。湖南科技大学雷芳讲师则对邦联国会在美国早期国家构建中的主体地位和核心作用加以肯定，认为它承担和行使了一个主权国家的基本职能。

其次是关于殖民地时期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追溯了殖民地时期“契约

工”制度的来源，认为该制度是英属北美殖民地解决劳动力供给的有效方式，并强调这是建立在个人自愿和同意原则基础之上的雇佣制度，关于契约工被转卖、遭受剥削和逃跑的问题，需要认真对待。此外，对契约工制度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挖掘，认为契约工和其他移民将欧洲的资本主义移植到了北美。四川大学的原祖杰教授指出，在北美殖民地早期，虽然上帝选民观念十分流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基于理性的公民意识在此阶段滋生成长，殖民地内部民众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杰斐逊也是与会者关注的焦点之一。福建师范大学王晓德教授认为疆土扩张和文化影响的有机结合是杰斐逊“自由帝国”观的实质，杰斐逊从传播“自由”的角度对美国大陆扩张的解释既符合美国人信仰的意识形态，又与美国政府的疆土扩张目标相一致。藉此，美国逐步地完成了北美大陆上的疆土扩张，然后靠着文化上的优势来构筑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大厦。厦门大学李丽婵副教授指出了杰斐逊与中国的种种关联，认为这些关联的产生是当时历史背景的产物。

## 二、美国外交史

美国外交史一直是美国史研究中的热点，也是本届年会提交论文最多的领域，共达31篇。从选题上看，与会者对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关注是突出的特色，表明了我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中美关系以及美国与诸大国的关系，研究范围日益扩大。

在这些论文中，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是关注的重点。其中有五篇关于中美关系的论文。南开大学赵学功教授考察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台湾计划出兵援韩以及美国的态度、台湾海峡中立化的解除等问题，揭示了美国对台政策以及美台关系错综复杂的变化，得出了朝鲜战争是导致美国对台政策转变的重要因素等结论。哈尔滨工程大学程早霞教授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历史演变，指出历史上美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是认同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主权的，只是到了冷战时代，美国才考虑承认西藏分裂势力提出的独立主张，但美国政府却终于没能公开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胡文涛副教授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了富布赖特中国项目的文化外交功效。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洁洁讨论的是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开端，认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受到了鼓舞和扶持，国民党的统治也受到了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国自由主义理念的冲击。厦门大学张光教授等人根据1997年至2008年的美国国会议员访台记录所做的分析，认为美国国会议员访台频繁变动受台湾岛内政治变动和美国国会选举周期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白建才教授探讨了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采取的隐蔽行动战略，具体分析了该战略实施的情况、特点与成效，认为这是冷战期间美国采取的最大的隐蔽行动，严重削弱了苏联的力量，最终迫使苏军撤出了阿富汗。厦门大学范鸿达副教授分析了自1979年成立以来伊朗现政权一直敌视美国的三点原因，并指出在探讨伊朗对美国的態度时，一定要注意区分伊朗官方和民众之间的态度差异。陕西师范大学于卫青副教授对美

---

国内学术界传统上将北美殖民地的半强制白人劳工称为“契约奴”，近年来出现“契约仆”的译法，梁茂信教授将这些契约移民称作“契约工”。

国在中东地区推行的文化外交进行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梳理。郑州大学王琛教授对 1947 年至 1954 年美巴同盟关系的形成进行了论述,认为美国放弃不干预的平衡政策是其冷战战略在南亚的集中表现。暨南大学陈奕平教授对冷战后美国与东盟国家关系进行了一些新思考,包括美国 - 东盟国家关系的性质和理论解释、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湖北经济学院代保平讲师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6023 号文件的出台入手,讨论了艾森豪威尔拉拢印尼陆军政策的确立。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温荣刚探讨了美国在老挝 1958 年的补充选举中扮演的角色,黑龙江大学李朋副教授分五个阶段介绍了美国在东北亚的利益和政策变迁。

武汉大学张德明教授探讨的是美国利用三次国际机遇达到对拉美进行经济扩张的目的,这三次国际机遇指的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造成的环境,西班牙、葡萄牙的拉美殖民地相继独立的 1815-1825 年这一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所造成的国际环境。浙江大学房建国讲师对苏伊士运河危机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局势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对之采取的政策和态度进行了分析。商丘师范学院冯志伟讲师讨论了杜鲁门政府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中间道路”政策。总的看来,除了中美关系之外,关于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论文多达 11 篇。而只有 1 篇论文专门讨论美国与大国的关系,即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宋微讨论的美国崛起过程中的对英外交。

美国主导国际政治和经济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成因与维持也受到了与会者的关注。外交学院熊志勇教授讨论了孤立主义政策的作用,认为孤立主义政策与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二者间即便没有必然联系,也有客观存在的影响。他指出,在成为经济大国后的半个世纪里,美国依然奉行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小心翼翼地避免同强国发生冲突。苏州大学金卫星教授认为美国主导下的全球国际经济机制的构建,是历届美国政府通过持续推行“门户开放”政策的结果,并分四个阶段回顾了 20 世纪美国构建全球国际经济机制的历程。暨南大学吴金平教授认为,在金融危机后,没有一个国家或国际集团可以取代美国的领导权。不过,美国自身需要做出一些改变,否则,美国的领导权将会继续被削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施爱国副教授指出,“巧实力”是美国在新国际格局中调整自我、为继续领导世界服务的手段,是新的国际格局下基于实力与灵活性的自由主义外交传统的回归。

与会者还讨论了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浙江师范大学赵志辉教授讨论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建立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内政治基础,指出罗斯福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想和基本原则是对威尔逊外交思想的继承,是美国国内政治原则和制度外化的典型表现。福建师范大学李昀讲师通过对美国利益团体与《1948 年经济合作法》出台的关系的探讨,揭示了国家权力体之外的社会因素与该法出台之间的联系。近年来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的关系备受学界关注,西北大学刘磊讲师讨论了冷战期间美国国会对外隐蔽行动的监督。浙江大学刘国柱教授介绍了从事对外民主援助的重要机构——美国全国民主基金会(NED)的产生和运作,指出该机构是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产物,也是冷战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郭新宇和孟虹也对非政府组织与美国民主援助问题进行了探讨。

此外,山西大学王荣声教授认为门罗咨文的实际设计师是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

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王磊讲师讨论了美国外交话语分析模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王吉美讲师对“9·11”后美国边界安全认知变化的原因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国际关系学院吴雪讲师和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王娟娟分别介绍了美国应对“国家失败”的政策和战后初期美国国家核管制政策。

从本次会议论文看，正如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在分组总结时所言，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除了范围扩大之外，还呈现出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选题更加具体等新特点。而选题过于厚今薄古以及过分依赖美国方面的材料，则是存在的主要不足。

### 三、美国城市史、经济史

美国城市史和经济史的论文共有 21 篇，其中的绝大多数论文反映了我国学者希望以美国的经验为中国的城市和经济提供借鉴的研究取向。

我国当前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城乡统筹发展、新城建设、城市交通、住房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城市史方面的论文提供了美国的经验。厦门大学王旭教授梳理了 20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美国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主要特点，讨论了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的互动以及功能上的置换、县域经济改革以及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负面问题，阐明美国县域经济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联系与总体规律。厦门大学罗思东副教授讨论的是新城市化时期美国县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拓展，认为县政府不同程度地承担了类似于城市政府的服务功能。福州大学谢菲讲师讨论的是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新城的几种模式及其启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王洋探讨了新城的含义及其思想起源，并总结美国早期新城建设的经验教训。浙江师范大学孙群郎教授指出严重依赖私人汽车的交通方式对美国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之后回顾了美国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并讨论了轨道交通复兴所产生的影响。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康丽颖讨论了地铁在纽约城市交通中所扮演的角色。厦门大学李莉讲师介绍了新政时期的美国公共住房建设政策及其影响。

此外，大连民族学院王玉平副教授探讨了美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衰变及其影响，厦门大学马晴虹副教授介绍了美国亚裔的郊区化，华东师范大学刘敏讲师对 19 世纪美国人口流动趋势与早期城市化问题进行了分析，江西师范大学杨长云讲师和漳州师范学院姬康讲师分别讨论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城市改革的模式和美国联邦政府城市援助政策的演变，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曹升生介绍了“小都市区”概念的提出、界定和影响。

在美国经济史方面，辽宁大学韩毅教授就 1929 年 2 月至 6 月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内部的货币政策之争进行了探讨，认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之间的争执，使得货币政策陷于瘫痪，因而丧失了利用货币政策挽救、至少是延缓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最后一次机会。鲁东大学王书丽副教授则就新政时期美国联邦政府银行业监管问题进行了探讨。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莉文副教授从起因、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和政府对策三个方面入手，回顾并比较美国 20 世纪以来经历过的四大经济危机。

西南大学黄贤全教授讨论了美国政府在西部开发中扮演的角色，认为美国政府既有贯穿始终的开发目标，又有一以贯之的开发思路，还有因地制宜的开发策略，因此美国政府居于主导地位。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津瑞提出对 1920 年代新政时期的田纳西河流域管

理局区域规划工程的看法。厦门大学韩宇副教授以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为例，探讨美国研究型大学在高技术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漳州师范学院王建红副教授讨论了伍德罗·威尔逊政府的反托拉斯立法与海外商业扩张的关系。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韩德江认为从内战结束到 19 世纪末期美国经济迅速发展，是因为美国走的是轻军备、重商业的发展道路。上述文章的出发点无疑是希望对我国政府解决当前面临的金融和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有所助益。

#### 四、美国政治史、社会史

长期以来，美国史上的政治制度、政党政治、政治思想和重大政治事件是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然而从本届年会的选题上看，上述传统政治史选题已是凤毛麟角，取而代之的是对宪政史、文官制度、州政府等问题的考察。南京大学任东来教授和江振春以“赫勒案”为例，探讨了美国最高法院宪法裁决中的平衡解释模式，认为这一解释模式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是宪法非原旨论解释模式的重要代表和诠释“活的宪法”的重要理论工具。中国政法大学胡晓进讲师考察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异议，并剖析了异议出现的原因。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郭巧华对美国学界有关约翰·马歇尔及其马歇尔法院的研究做了述评。辽宁大学石庆环教授从美国中产阶级结构的变迁与基本特征、文官群体的社会阶级属性与文化特性以及中产阶级的政治倾向与文官政治中立原则等三个方面，探讨了美国文官政治中立原则得以确立和实施以及政治中立传统得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成因。洛阳师范学院杨成良副教授认为直接立法对美国州政府民主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但存有不完善之处，西南大学王勇讲师介绍了美国州政府参与外交事务的历史轨迹及其根源。西北大学王新刚教授讨论了美国新保守派及其影响，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徐红彦介绍了 1952 年以来美国科技移民政策的发展演变及影响。

在美国社会史领域，与会者分别讨论了族裔史、妇女史和环境史等方面的问题。厦门大学胡锦涛山副教授考察了 1970-2000 年美国黑人从北部回迁南部的现象，并从北部的推力和南部的拉力入手，解析这种不同以往的逆向迁徙运动出现的原因。哈尔滨师范大学杨超副教授指出“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出台标志着美国黑人平等就业权政策的形成。首都师范大学于展讲师认为，在非暴力直接行动的主导下，再辅之以其他策略的支持与帮助，民权运动才取得了胜利。南开大学丁见民讲师以印第安人为中心考察了黑人奴隶制在土著部落中是如何产生的，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美国早期印第安人、白人与黑人三大种族之间的关系。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江振鹏介绍了 19 世纪 50-80 年代爱尔兰裔美国人以北美地区为基地反对英国高压统治的民族主义活动，认为英国对芬尼亚运动的治理体现了现代反恐政策的雏形。南开大学张聚国副教授从废奴主义者对于妇女权利的立场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女权运动和黑人争取自由这两场运动之间的关系。宁波大学周莉萍副教授介绍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女权主义发展状况。河南大学硕士研究生龙晓华介绍了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期美国的童工问题。

具有反环保色彩的里根政府关于环境问题的内政外交引起了一些与会者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再荣研究员认为环境政策是里根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里根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立法手段实现环境政策的变革，对环境管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是里

根政府环境政策的一项创新。上海大学夏正伟副教授指出，科学和美国国内环保主义者的支持是推动里根政府参与臭氧环境国际合作的主要动力，里根的臭氧环境外交表明他并非一直处于环境保护的对立面。南开大学付成双副教授讨论的是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以及白人永久定居北美洲以前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其周围环境的影响。

此外，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文教授讨论了美国“法律社会化”问题，山东师范大学邢佳佳副教授追溯了美国社会工作的起源，大连民族学院郭九林副教授探讨了美国禁酒运动的社会影响及其性质。安徽师范大学韩家炳副教授对二战后美国教育的四次危机进行了评介。另有两篇关于美国军事史的论文，山东师范大学陈海宏教授认为一战前的美国陆军总参谋长伦纳德·伍德开展的扩军备战运动使美国的军事面貌一新，为参加即将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山东经济学院的李海平讨论了美国内战中海战的重要性。

## 五、美国宗教史、思想文化史

近年来我国的美国宗教史从无到有，处于上升趋势。东北师范大学的董小川教授和崔利伟对国内学界对美国宗教与宗教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评论，认为国内对美国宗教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尝试阶段，对美国宗教史问题的研究仍然任重道远。国家宗教局刘金光副司长分析了美国的宗教自由观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讨论的重点是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损害，以及宗教因素在“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新关系定位中的影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王华讲师考察了1778年至1840年间夏威夷群岛宗教生活变迁，指出了西方文明的入侵对其社会结构造成的影响。宁波大学谷雪梅副教授介绍了近代美国长老会在浙江的传教活动，厦门大学硕士研究生李文硕探讨了17世纪塞勒姆审巫案的起源。

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孙有中教授探讨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大萧条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分析了杜威对理想民主的理论构建。山东师范大学王静副教授对美国“天定命运”之后的扩张思潮“青年美国”进行了探讨。年会上有三篇论文论及传媒的作用。温州大学郑春生教授分析了著名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思想的传播方式，认为讲台、著作、在场和媒体等多种途径的传播使其成为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左派的精神领袖。湖南师范大学谢文玉讲师以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代表人物汤姆·海登在美国大众文化媒介中的形象和他自己为迎合和顺应主流社会而塑造的自我形象为个案，分析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个体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上海交通大学的助理研究员崔辰分析了美国电影中的总统形象。

## 六、美国史学史、网络资源与教学

与会者就美国史的研究方法和现状展开了讨论。北京大学王立新教授认为中国的美国外交史研究长期以档案研究和传统叙事为主，亟需将跨学科理论与方法引入。他指出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引入不仅不会削弱外交史的史学色彩，反而会加强外交史的人文特征，并有助于建立起关于外交史的新叙事。渤海大学曲升副教授讨论了美国外交史学的“文化转向”，认为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源于并适应了国际关系现实的变化，但夸大文

化的重要性，否认传统研究的意义倾向是不可取的。西北政法大学的侯学华副教授介绍了美国早期史的政治学研究视角。复旦大学博士后贾敏提出了对 20 世纪美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一些思考。首都师范大学周钢教授回顾了美国史学界对非洲裔美国牛仔研究状况，东北师范大学王邵励副教授讨论了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的一系列史学认识理论。

与会者还讨论了国外对中国相关问题的看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孔庆山教授认为海外媒体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多为对中国的负面描述，缺乏客观的学术研究。大连大学张宏副教授指出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式发生了变化，不再用中国妇女的受害者模式观察中国，但仍无法彻底摆脱东方主义。宁波大学的贾庆军副教授分析了美国学者倪德卫（David S. Nivision）对章学诚进行的研究。与上述文章的角度相反，厦门大学盛嘉教授解读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革命的态度，认为中共对美国革命的认同与诠释虽然具有很强的功利化倾向，但是，美国革命为共产党人在争取合法的政治地位和最后夺取国家政权过程中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政治想象的空间。

与前两届年会一样，美国史研究的网络资源继续受到关注。北京师范大学黄安年教授以 2007-2009 年黄安年博文为例，讨论了网络博客在推动美国研究的普及和提高方面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庆龙研究员探讨了国内美国史研究网上资源共享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认为资源共享的扩大和深入，必将有助于我国美国史研究再上一个台阶。

在此次年会上，美国史教学问题受到了超乎以往的关注。北京大学王希教授以 1949-1979 年和 1979-2009 年为两个发展阶段介绍了新中国的美国史教学，指出国家体制对学科设置的限制、人文学科在经济发展阶段中的总体劣势、史学学科地位的衰减都对美国史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规模发展制造了制度性的障碍，中国在培养研究生的方法和力度以及学科布局和梯队建设上存在明显差距。武汉大学潘迎春教授介绍了开设全校通识选修课《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教学体会，河南大学王金虎教授介绍了美国历史学家加里·纳什的教学构想，认为纳什是通过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历史思考能力。南昌航空大学马万利副教授通过介绍他的译著《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讨论了美国在历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 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续）

王 旭

各位会员：

2008年5月武汉年会通过的新章程规定，研究会年会由三年改为每两年举办一届，每两届年会时进行理事会换届，因此，武汉年会没有进行理事会换届。在该次年会上曾汇报理事会工作，这次工作报告属于第十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的续篇，但重点是在武汉年会后的工作。

### 一、纪念研究会成立 30 周年

2009年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经过与我国改革开放同行的30个春秋的风雨历程，我会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一个国别史学会组织，有许多值得回顾总结的业绩和经验。秘书处以此事作为2009年中心工作，在国内各相关院校、研究机构和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编写大事记。研究会大事记的编写工作看似简单，实则琐碎繁复。研究会30年的发展历程，究竟发生了哪些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究竟哪些事件应“载入史册”，是颇费周折的事情。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武汉大学秘书处时期保留下来的珍贵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数月的艰辛努力，几易其稿。在此过程中，秘书处多次征询常务理事会和顾问的意见，对大事记进行修改，方最终定稿。

第二，顾问访谈。这项工作是很多会员期盼的，秘书处也筹划许久。此前黄柯可顾问等曾多次提及采访老一辈学者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此次借我会成立30周年东风，秘书处组织了对我会顾问的访谈活动。秘书处致函各地的顾问和理事，布置采访工作。秘书处事先拟定了采访提纲，内容包括：回顾我会重要事件、在我会任职期间的体会、对历任秘书处工作的评价和对今后工作的期望等。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除了因身在国外和住院治疗等原因无法接受采访的五位顾问之外（希望以后有机会加以弥补），其余的顾问全部参加了此次访谈活动。

顾问访谈活动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要感谢各位顾问前辈的大力支持。很多顾问年事已高，但仍积极配合，令我们感动。黄绍湘、刘绪贻、杨生茂等年逾九旬，对此次访谈工作仍欣然配合，接受采访。黄绍湘先生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亲自提笔写下对青年学者的寄语。南开把采访记录发给秘书处之后，杨先生还反复阅读、字斟句酌，先后三次委托女儿杨令侠发来邮件，对记录进行修改。邓蜀生、方生等老先生也十分认真，访谈前专门做了准备，然后仔细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李世洞、黄安年、黄柯可顾问都撰写了纪念研究会成立30周年的长文。张友伦、齐文颖、时殷弘等顾问也在采访中深情回顾研究会历史。时任我国驻苏里南大使（后转赴我国驻冰岛大使）的苏格顾问还专门给王旭秘书长打来国际长途，深情回顾研究会历史，并期盼研究会工作不断锦上添花。从研究会前辈的回顾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创立之不易，成长之艰辛。研究会

能有今日之规模和影响，有多少前辈同仁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他们的回顾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传承至今的光荣传统，前辈们不计个人得失的奉献精神，不争名逐利、以大局为重的团结作风，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从他们的话语中，我们更感受到了肩上责任之重大，他们为研究会的工作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唯有更加努力，做好研究会的工作，才能不辜负前辈学者和全体会员的信任和期待。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前任秘书长李世洞和黄安年。李世洞教授对大事记一一核对，提出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修正意见。还把自己珍藏的研究会年会照片发来，其中1980年的烟台年会和1986年的成都年会是我们一直欠缺的（其他各次年会照片我们均收受并挂在网站上），弥足珍贵。黄安年顾问在其个人博客上，详尽记述了有关美国史研究会的情况，其中包括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甚至历年年会的照片他都一一标出了名字，这为我们回顾研究会历史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研究会网站的很多内容也直接来自他的博客。

这次访谈活动的顺利进行也得益于各地理事的合作。接受委托的理事们积极行动，不顾自身事务繁忙，以多种方式配合秘书处圆满完成了访谈工作。北京的孟庆龙、王立新和高国荣，天津的赵学功，武汉的潘迎春、上海的王春来等会员，奔走联络，登门造访，录音录像，功不可没。对于一些不便安排当面采访的，秘书处直接通过长途电话采访（包括同步录音）。为了达到良好的录音效果，秘书处专门购置了新的电话机。在《通讯》上刊录的访谈，我们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只是在极个别地方进行了技术性处理。

第三，在研究会网站上开辟“纪念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30周年”专栏。上述顾问访谈，除笔谈外，均有录音，还有部分照片和录像，都妥善地收录在秘书处，有需要者可以与秘书处联系。该专栏还登载了其他回忆性的文章，以便于会员和网站访问者了解我会的发展历程。

在此过程中，秘书处搜集整理了一批珍贵资料。秘书处设在武汉大学时，我会最初四届秘书长刘绪贻先生和李世洞先生对学会建设做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收集整理了丰富的档案史料。秘书处迁至南开大学后，由于历史原因，这些资料并未同时移交南开大学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长期以来存放在武汉大学。在秘书处迁至厦门大学后，我会顾问李世洞先生多次与秘书处通信联系，希望尽快将这些记载我会筚路蓝缕开创时期的宝贵档案资料移交厦门大学秘书处，以期妥善保管。今年春天这批资料终于顺利移交给厦门大学秘书处，方便了秘书处编写30年大事记。同时，在南开秘书处的大力配合下，秘书处也对南开秘书处移交的资料进行了重新整理，完善了研究会档案工作。

## 二、网站建设和《美国史研究通讯》工作

自2003年1月1日开设以来，研究会网站一直是秘书处工作的重点。为了改进网站使其更好地为会员服务，武汉年会后，秘书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网站建设的下一步工作。最重要的举措是加大了对网站的人力投入，共有五人参与网站的建设与维护，并对网站工作人员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分工（与网站起步头两年单兵作战相比已有极大的改观）。加快了网站更新的频率，并且开始进行博硕士论文和会员成果栏目的建设。网站的更新工作看似简单，要做到持之以恒并非易事，更让人头疼的是黑客的破坏。从2008年12月14日开始，网站又出现问题，无法添加信息，而帮助我们设计网站的老师又患

病住院，不能及时解决问题，只好暂停更新，但仍可正常登录。为了保证网站的安全性，秘书处加大投入，委托一家高水平的专业网站设计公司建设了新的网站。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美国史研究会网站第三版开始运行。迄今为止，除了暑假期间由于新疆事件的影响（我会网站的服务器设在郑州），有一段时间无法登录外，运行基本正常。根据网站信息的点击率可以看出我们网站的人气很高，已形成良性循环。我会网站建设多次受到有关部门的肯定。

网站除了日常的更新外，重点建设了美国史《通讯》栏目。该栏目登载我会出版的《通讯》，在网站创立之初就已经设立。但是近几年的通讯没有及时上网，给会员查找相关信息带来诸多不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终于将近年的《通讯》全部上网。

《美国史研究通讯》的编辑和印刷发行是研究会的另一重要工作。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会刊，《通讯》在很大程度上、至少是在一些重要研究领域，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美国史研究整个学科的基本面貌和主要动向，并成为会员间沟通信息的重要平台。也正因如此，本刊长期以来深得我会会员的厚爱。

2008年第一期《通讯》是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的专辑，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该期《通讯》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刊的第100期。自30年前在武汉大学呱呱落地，《通讯》一直在不断成长进步，栏目不断推陈出新，内容日益丰富，如李世洞先生所言，经历了从武大时期的油印版、到南开时期的铅字版、到厦门大学时期电脑版的升级换代，发行量也大幅增加。其发展变化见证了研究会的成长和壮大，已成为我会的重要窗口和维系广大会员的情感纽带。作为一个非正式出版的内部刊物，《通讯》能够维持至今实属不易，依靠的是广大会员的鼎力支持和历任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无私奉献。当然，《通讯》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秘书处工作人员的细心培植，更需要广大会员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帮助。

2008年第二期《通讯》刊发了2005年至2008年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美国史方向博硕士论文目录。这是我会《通讯》一个传统栏目，作为反映我国美国史研究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可供各院校在读研究生学习交流，并避免重复选题。秘书处曾给我会理事逐个发去邮件，希望相关理事能协助提交各理事所在院校攻读美国史博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论文题目等信息，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无法获取完整的信息，只好将目前所掌握的博硕士论文目录登出。秘书处希望能够得到研究会各理事单位更加积极的支持和配合。

2009年第一期《通讯》是研究会创建30周年纪念专刊。其内容包括上面谈到的大事记和顾问访谈，也有我会历届理事会情况和我会设立的奖学金和科研奖的情况，丰富并有独特的价值，相信会员都会从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收获。李剑鸣理事长对研究会30年的发展情况做了这样的总结：“在这30年里，我们的美国史研究从最初的编译和编写，逐渐转变为具有创造性的探讨；研究领域从单一的政治史和外交史，扩展到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城市史和环境史等众多的领域；写作方式从宏阔而浮泛的议论，逐渐转变为细致而专精的表述。虽然研究会的会员人数并没有明显的增加，但出自会员之手的论著则不仅数量大增，而且学术价值也愈益受到重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才培养和资料建设有了巨大的进步，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发展的前景愈益乐观可喜。”应该说，这些概括和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2009年第二期《通讯》内容也很丰富，尤其是学术动态很多，信息量大。同时还专门刊发有一定深度的研究论文。

网站和《通讯》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广大会员的大力支持。研究会的一些理事单位，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社科院世界史所，还有黄安年顾问等个人，为研究会的网站和《通讯》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三、筹备第十三届年会

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2009年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秘书处曾多方联系，最后，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觉得厦门大学条件较为成熟。这当然是由于秘书处自2002年起就设在厦门大学，那里的美国史研究已有一定基础，校方重视。同时也在于厦门的环境比较好，设施较完善，便于会议安排，对会员也会有一定的吸引力。时间定在2010年4月下旬。届时各校研究生论文已大致完成，指导教师能够抽出时间。而且，这个季节厦门天气宜人。

秘书处于11月初发出了第一轮通知。为了节省开支和便于联络，此次通知由电子邮件发出（经过多年的建设，秘书处拥有绝大多数会员的电子邮件联络方式）并在我会的网站登出。但是，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会员留给秘书处的地址已经多年不用而作废，邮件无法送达，或者由于会员有多个电子邮件地址，没有及时查收邮件，凡此种种，导致有些会员没有及时收到秘书处发出的邮件。为了使广大会员了解年会召开的信息，秘书处在社科院世界史所的网站发布了会议的第一轮通知，并且在2009年第2期《通讯》再次刊出会议通知，这样那些没有收到电子邮件的会员也可以知晓会议信息。并且继续2008年武汉年会的成功经验，单独设立一个信箱处理会议往来信件，高效、准确、及时、经济。

2009年12月16日上午，研究会在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召开理事工作会议。参加人主要有：理事长李剑鸣、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王旭、副理事长王玮、梁茂信、孟庆龙，京津地区理事王立新、王希、高国荣、肖军，副秘书长韩宇等。副理事长任东来、何顺果、白建才等有事未出席，但都对会议讨论的问题表达了书面意见。会议由李剑鸣教授主持，主要讨论了本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的筹办、理事会换届等问题。综合这次会议和筹备过程中多次征询常务理事的意见，本届年会期间将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审议秘书处工作报告，理事会换届工作。同时举办学术讨论会以及会员研究成果展。学术讨论会主要围绕下列议题：美国现实重大热点问题的历史考察；美国史学最新趋势及新方法；美国与其他国家历史的联系与比较；美国历史研究网络资源与研究手段创新；美国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遗存；美国历史研究和教学的其他问题。

经过认真的准备和多方努力，会议得以顺利召开。此次会议经过周密的筹备，进展比较顺利，发来回执的人很多。现在实际到会的代表130余人，提交论文113篇。黄安年顾问、刘绪贻顾问、王玮副理事长等虽不能到会，但也发来论文全文。这次会议规模与历次年会相比，有一定增加，论文选题范围也很广。会议除学术讨论外，还要进行理事会改选，会员成果展览，数据库推介等。会议议程非常紧张，在接下来的2天时间里，让我们共同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

另外，我会还于 2009 年 9 月协办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第四届世界美国学大会”，李剑鸣理事长在会上作了开幕式的主题发言。

#### 四、秘书处其他工作

1、发展新会员。许多美国史教学和研究人员、研究生希望加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向他们介绍了入会标准并发送了新会员入会申请。有会员请求秘书处出具会员证明的电子版，以满足聘用单位的要求。秘书处尽快制作了电子版的会员证明，并在第一时间内发给了会员。

2、研究会章程修改核准。研究会章程修改章程报告上报世界史所和国家民政部审批。自 2008 年下半年开始办理新章程核准事宜，按照民政部要求填写了“社会团体章程核准表”和“社会团体变更登记表”，并寄往社科院世界史所科研处的陆晓芳处。2009 年 2 月又接到世界史所通知，根据民政部要求，章程核准还要登陆中国社会组织网，在网上申报章程变更内容。由于在网站上填写章程全部内容采取的是填空的方式，许多在 2008 年 5 月会员大会新通过的章程内容恰好无法填入。在尽可能按照网站表格要求填好后，等待民政部审核期间，将纸质版本新章程寄给陆晓芳，以便其到民政部办理正式手续。6 月底接到民政部通知，网上新章程填写有问题，并列出了有问题的条款，需要我们修改新章程。王旭秘书长与李剑鸣理事长商量之后，决定除一条与民政部达成共识保留外，其他都按照网站要求填写。再次重新填写表格之后，陆晓芳到民政部正式办理手续。

3、法人代表变更的后续工作。2008 年，秘书处用一年时间才获得民政部的正式批复，2009 年 3 月份，我会账户所在的中国建设银行又通知办理法人代表变更事宜。由于建行要求法人代表身份证原件，但是恰逢孟庆龙研究员期间在北京也需要使用身份证，故多次与银行交涉，在其支行行长同意的情况下以复印件形式代替。将需签字的授权书以电子版形式发送，请孟庆龙签字后打印，同其身份证复印件一并寄回秘书处。将授权书交至建行，建行开始提供办理变更事宜的申请表格，其后是更换用户管理协议、客户信息表等一系列表格，最后是更换开户许可证和印鉴卡。期间多次麻烦孟庆龙，多份表格寄送孟庆龙签字审核，前后历时两个月之久。到 5 月中旬，建行才通知去领新的开户许可证和印鉴卡，账户可以重新开始使用。

4、研究会账户转行。2009 年 5 月下旬，建行账户刚刚办妥，尚未启用，又接社科院通知，要求所有非工商银行的学会账户需全部转为工商银行账户。孟庆龙来信，称 6 月份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个人身份证，并且，9 月份还要去英国一个月，故秘书处无法在规定的 9 月 15 日截止日期前办理转户，只好向社科院打报告申请延期，并做先期准备工作。其中包括在国家财政部网站下载中央预算单位财务系统，填写其中的单位基本信息与开户申请表，到财政部厦门专员办办理批复书等。9 月孟庆龙回来后，秘书李莉带着批复书、研究会证书、法人身份证和填写好的工行账户管理档案袋（内含法人授权书、管理协议、客户信息表等多种表格）到工商银行厦大支行柜台办理开户，并同时到建行撤销账户。其间两家银行互相推委，颇费周折。直至 2010 年 1 月，方将建行账户内资金全部转入工行新账户，新账户在厦门专员办备案并参加 2009 年度年检。

5、年检，日前所有表格均添妥上报，在等待年检结果。

6、“小金库”专项治理的配合工作。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由于我会不存在小金库现象，因此按照世界史所要求寄去盖章说明一份。在陆晓芳的帮助之下，该项工作完成比较顺利。

7、改革和加强研究会的管理与服务，推进秘书处工作的科学化、信息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全面提高研究会管理和服务工作水平。第一，继续坚持秘书长办公制度、常务理事年会制度，及时召开理事会议，充分发挥各院校、研究所理事的作用。第二，明确秘书处各成员的工作职责，做到责任到位，完善网络建设、《通讯》编辑发行、邮件处理、财务审查，使秘书处的工作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效解决了研究会工作任务繁杂、人员少的问题。第三，加强更新硬件设施，加大办公自动化的力度。第四，重视会员的发展和联络工作。为了获取会员最新的联系方式，研究会秘书处在前些年对会员重新登记的基础上，进一步着手会员资料的整理、统计工作，更新了会员数据库，重视会员的联络工作，健全了会员电子邮件联系网。并加强对会员动态的了解与通报，及时通报各院校、研究机构会员的活动信息，加强沟通和服务。

## 五、秘书处财务报告

收入：1、上年末账户余额 47803.62 元；2、社科院科研处下拨活动经费 17400 元；3、会费收入 8810 元。共计：74013.62 元。

支出：1、《通讯》每期 2000，4 期合计 8000 元；2、网站建设与网站维护 3000 元；3、办公费（电话、传真、邮寄、设备维护费、差旅费、财务审计费、理事会会费、银行转帐手续费和专职秘书津贴等）8676 元。共计：19676 元。

收支相抵后剩余：54337.62 元。

## 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工作的建议

1、电子邮件地址和邮递地址的更新。目前的会员电子邮件和邮递地址基本上是 2002 年重新登记时的信息。尽管秘书处很注意更新调整，但由于一些会员改变了电邮地址，或者由于毕业和工作调动等原因邮递地址发生变更，但是没有及时通知秘书处，造成了电子邮件和通讯无法及时送达，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希望今后加强与秘书处的联系，尤其流动性很大的研究生会员。另外，为节约开支，同时又因为研究生会员经常可以浏览网站，今后就不必再给研究生会员寄送纸质版的《通讯》。确有需要者，可直接向秘书处联系索取。相应地，研究生会员可免交会员费。

2、出版著作和访学等信息的搜集和报道。我会会员出版美国史专著和译著、或者出国访学，有的会员给秘书处发送了信息，还有很多并没有提供相关的信息，秘书处无法进行及时的报道。今后要烦请各理事单位的通讯员定期发送本单位的学术动态。其次，应该建一个会员研究成果资料库，将会员的所有成果（至少是目录）挂在研究会网上，经作者同意，文章也可以挂在网上，以便于会员查阅。美国史博硕士论文题录是我会《通讯》一个传统栏目，目前已刊录的还不完整，希望本次会议真正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3、万心蕙奖学金工作还须细化，真正起到鼓励推动博士、硕士研究生从事美国史研究的积极性。

我们的工作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和需要改进的地方，恳请各位会员多多提出批评和建议，这对秘书处工作的改进和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要对大力支持研究会工作的各位会员表示诚挚的谢意，各位会员的支持和合作是我会发展壮大前提和基础，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今日的成就是广大会员积极参与和支持的结果，有你们的鼎力相助，研究会必然有更辉煌的明天！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届理事会

2010-4-24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一届理事会通报

(一) 经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全体会员代表于 2010 年 4 月 25 日无记名投票选举, 产生了第十一届理事会, 成员共 37 名。名单如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孔庆山 王 旭 王 玮 王 琛 王立新 王金虎 王春来 白建才 石庆环(女)  
任东来 刘国柱 孙有中 孙建党 孙群郎 何顺果 吴金平 张聚国 李 莉(女)  
肖 军 陈海宏 周祥森 孟庆龙 金卫星 胡国成 胡锦涛(女) 赵志辉 赵学功  
原祖杰 高国荣 梁茂信 黄贤全 董小川 韩 毅 韩 宇 潘迎春(女) 戴超武  
魏红霞(女)

(二) 经第十一届理事会 4 月 25 日推选, 产生了本届理事会理事长、秘书长, 副理事长由理事会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名单如下:

理事长: 王 旭

副理事长(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玮 王立新 任东来 孟庆龙(法人代表) 赵学功 梁茂信

秘书长: 韩 宇

(三) 经第十一届理事会 4 月 25 日无记名投票选举, 产生了本届常务理事会, 成员共 15 名, 名单如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孔庆山 王 旭 王 玮 王立新 白建才 任东来 刘国柱 陈海宏 金卫星  
孟庆龙 胡国成 赵学功 梁茂信 韩 宇 潘迎春(女)

(四) 经理事长提名, 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 4 月 25 日决定了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聘任。名单如下:

胡锦涛(副秘书长) 高国荣(副秘书长) 李 莉 李文硕(兼职学术秘书)

(五) 经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 4 月 25 日研究, 决定聘请 20 名知名学者为本会顾问, 名单如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方 生 王 希 邓蜀生 刘绪贻 华庆昭 齐文颖 何顺果 余志森 张友伦  
时殷弘 李世洞 李剑鸣 杨生茂 苏 格 武文军 祝立明 顾学稼 黄安年  
黄绍湘 黄柯可

(六) 经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 4 月 25 日研究, 决定成立新一届万心蕙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成员名单如下:

王 旭(主任委员) 黄安年 王 玮 王立新 任东来 孟庆龙 赵学功 梁茂信  
韩 宇

(七) 经第十一届常务理事会 4 月 25 日研究, 决定成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会刊《美国史研究通讯》新一届编委会, 成员如下:

主编: 王 旭 副主编: 胡锦涛 韩 宇

(八)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团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本届理事会秘书长以上人员名单已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审批。

## 贺 信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欣闻我会第十三届年会将于本月 23-26 日在厦门大学召开，十分高兴。可惜我因年老体弱耳聋，势难与会。特提交“和而不同——记我与美国著名史学家柯特勒的友谊”一文，并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全体代表健康愉快、取得研究工作的新成就。

刘绪贻敬贺

2010 年 4 月 10 日

我年岁大了，身体差了，不能与会了，真遗憾！

预祝年会成功，祝与会朋友们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邓蜀生

王旭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并大会秘书处：

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开会之际，请允许我以一个老会员的名义向大会表示衷心的祝愿。我自 1979 年中国美国史筹备会议和成立会议以来，除 1999 年南京会议（那时我在美国）外参加了历届所有年会，见证了研究会从初创奠基走向发展壮大全过程，深感作为一个研究会成员的责任和荣耀。遗憾的是这次因在家苦练“孙子兵法”而难以脱身，只能提交一篇《网络博客与美国研究的普及和提高》论文求教于各位新老会员。

网络时代和中美关系发展的新时期，向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提出了美国史研究普及和提高的新课题、新思路、新方法、新挑战，殷切期望大会取得新成果和新共识。

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授黄安年

2010 年 4 月 9 日于北京天通苑

尊敬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李剑鸣理事长

尊敬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王旭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尊敬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各位同仁及出席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 13 届年会的全体会员：

值此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 13 届年会在厦门大学召开之际，我谨代表陕西师范大学欧美研究所及全体世界史同仁对大会的召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自 1979 年成立以来，在老一辈学者的引领下，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还是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为国人称颂，为学界瞩目。这是我们全体会员的骄傲。今天，我们的学会已走过了 31 个春秋，步入而立之年；人类社会也迈进了新世纪的第 2 个十年。路漫漫而修远，研究尚未有穷期。美国史研究中，还有许多领域需要我们去开拓，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深化，许多知识需要我们去传播。我们相信，有老一代学者开创的良好

局面和科学严谨之风，有青年才俊的不畏艰难努力攀登薪火传承，我们的美国史研究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我因家有急事难以赴会，特书数语聊表寸心。

祝大会圆满成功！

陕西师范大学欧美研究所所长、世界史学科带头人 白建才

2010年4月23日

## 理事简介

**孔庆山**，1956年生，河北平乡人。历史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1982年于河北师范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和2002年于南开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89年至1990年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学习。2006年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驻所研究半年。2009-2010年于美国Texas A&M University访学半年。著有《美国早期土地制度研究 1785—1862》，同名博士论文获2002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万心蕙奖一等奖。《中国县级行政管理研究》（国家“七五”重点课题，合著）获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二等奖和河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

**王旭**，历史学博士（1990），教授（1993），博士生导师（1995）。历任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厦门大学社科处处长，美国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美国历史、美国城市史和城市化比较研究。著有《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等个人专著4部、《中美城市化及其比较》等编著3部、《全球城市史》等译著5部；学术论文70余篇。曾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并多次赴欧美和大洋洲从事学术交流活动，其中包括两度获得富布赖特高级研究学者基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教育部项目3项。分别获省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5项，市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项。1993年起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首批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06年起受聘历史学“闽江学者”特聘教授；2009年起受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

**王玮**，1945年5月出生。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史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和世界史博士点负责人。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务院政府特贴获得者、山东省文史馆员、山东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世界史专业委员会主任。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史。主要著作有：《美国外交政策史》（副主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美国外交思想史》（合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并主持国家级精品课程《世界近代史》，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

**王琛**，1967年7月生，河南省息县人，1999年9月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历史学（国际关系史）博士学位，现任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史、美国与南亚东南亚关系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史学月刊》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2篇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出版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与南亚均势（1947-1963）》，译著《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与中外合作项目各1项。现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2002年），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2006年），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2002年），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2004年），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2009年）。

**王立新**，1966年10月生，199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6-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北京市新世纪中青年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为人事部等七

部委评选的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曾担任耶鲁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伊利诺伊大学弗里曼访问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王宽诚访问学人。主要从事美国对外关系史、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专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 - 1928)》(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0 年版)获第三届全国高校人文与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初版, 2008 年修订版)获天津市优秀社科图书二等奖。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约 50 篇。

**王金虎**, 1962 年 12 月生, 河南安阳人, 历史学博士,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河南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美国社会史研究, 先后在《河南大学学报》、《史学月刊》、《世界历史》、《安徽史学》、《美国研究》、《历史教学》和《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 20 余篇, 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复印, 或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摘录。毕业论文“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2008 年 5 月获得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四届万心蕙优秀博士论文一等奖。著作《南部奴隶主与美国内战》获得 2006 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主编教材有《美国历史》和《世界通史现代史卷》。讲授美国史、美国社会史、美国历史问题和美国历史研究方法等课程。

**白建才**, 1949 年 11 月生,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欧美研究所所长, 兼任中国世界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西北分会副会长, 陕西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 《世界历史》编委会委员,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编委会委员,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科学部委员、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督导委员会委员等。主要从事世界现代史、美国史和冷战史的研究, 曾于 1991 - 1994 年由学校公派在美国密苏里(哥伦比亚)州立大学进修研究, 2001 年获国家出国留学基金委资助在哈佛大学作高级访问学者。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主编、独著《美苏冷战史》、《美国:从殖民地到惟一超级大国》、《星条旗下的荣衰》、《俄罗斯帝国》、《世界十大将帅》等。获陕西省政府、陕西省高校优秀社科成果奖多次, 并曾两次获校教学质量优秀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石庆环**, 女, 1958 年 12 月出生, 历史学博士。曾执教于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现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历史学院副院长, 美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制度史。1997-1998 年度为美国基督教亚洲联合董事会项目研究学者; 2001-2002 年度为美国政府富布赖特基金会项目研究学者。著有《20 世纪美国文官制度与官僚政治》等书; 并在《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美国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以及其他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承担过中共中央组织人事制度改革拓展项目“英美两国主要执政党官员培养选拔制度比较研究”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二战以来美国中产阶级构成的变化——以文官群体为研究中心”。

**任东来**, 1961 年生, 1982 年、1985 年和 1988 年先后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获得历史学学士、国际关系法学硕士和世界史博士学位。1988 年 7 月开始执教于南京大学 - 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1982

年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2001年起担任副理事长。1992年以来，曾多次前往美国、挪威、意大利和香港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访问、研究和讲学。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美中心开设过美国历史选读、美国外交史、中美关系、美国宪法与最高法院、国际冷战等研究生课程。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美国外交史、美国宪政史、中美关系。参与或主持撰写主要学术著作有：《美国外交政策史》（参与、人民出版社，1991）；《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当代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成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美国宪政历程：塑造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005）；《政治世界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小视角下的大历史》（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刘国柱**，1965年生，河北辛集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1991年）、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2004年）、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2004.9-2007.6），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访问学者（2007.9-2008.7）。现为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特约理事、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史学理论研究》、《美国研究》、《浙江大学学报》、《南开学报》、《国际关系评论》、《史学月刊》、《学海》、《历史档案》、《安徽史学》、《历史教学》等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20余篇，著有《美国文化的新边疆——冷战时期的和平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博士文库，2005年），合著有《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006）、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2004）各一项；参加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美国对外关系史”（撰写第二卷）。

**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国史学会理事，中国跨文化交际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会副会长。在复旦大学获世界史博士学位，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完成博士后研究，曾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访学和讲学。从事美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和跨文化传播研究。著述包括《美国精神的象征：杜威社会思想研究》、《细说美利坚》、《现代美国大众文化》（第二署名）、《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美国文化产业》（第一署名）和译著《新旧个人主义——杜威文选》（第一署名）；主编教材 *Intercultural Mass Communication: Approaches to Key Texts in Cultural Studies*、《西方思想经典导读》；主编论文集《英语教育与人文通识教育》、《跨文化视角》和《跨文化研究前沿》；此外还主编了《美国实用哲学研究译丛》。在国内外发表了50多篇论文。担任国际美国学研究会期刊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 编委和《跨文化交际研究》副主编。

**孙建党**，1969年4月生，河南省汝州人。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博士学位，2004-2006年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译著1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主要论文有：“美国在战后东南亚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政策”、“战后初期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政策困境及其原因”、“科伦坡计划及其对战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援助”、“东南亚国家对美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

析(1945-1970)”、“东南亚国家的国际收支波动及其影响因素(1945-1970)”等。

**孙群郎**，1966年生，河北省安新县人，1998年考入东北师大历史系，师从于丁则民教授从事美国史的学习和研究，2001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随后到南京大学历史系从事世界史博士后研究工作。2003年博士后出站，回母校东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工作，并破格提升为教授。2004-2005年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一年。2006年提升为博士生导师。2009年到浙江师大人文学院工作。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论文《美国城市交通的发展与城市生态组织的变迁》获得2002年河北省社科联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专著《美国城市郊区化研究》获得第三届长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二等奖。2008年独立承担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美国城市郊区化的危害及其困境”。

**吴金平**，1966年3月出生，1988年6月湖北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本科毕业，1997年6月在南开大学获历史学(美国史方向)博士学位。现为暨南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导师、美国史方向硕士生导师、暨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法学分委会成员、暨南大学政治学学科组成员。曾到菲律宾德拉萨拉大学、菲律宾华人博物馆、美国纽约大学、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台湾成功大学和政治大学等地作访问学者或研究。美国史方面代表作为：Frederick Douglass and the Black Liberation Movement: the North Star of American Blacks (New York &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2000)。最新出版物为：主持翻译并校订卡恩斯等著《美国通史》(116万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现在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移民与亚太国际关系、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张聚国**，1969年10月生，199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目前主要从事19世纪美国史、美国种族和女权问题研究。著有专著《杜波依斯与美国种族问题》(纽约Routledge出版公司2000年英文版)；合著《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译著：《美国平等的历程》(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沉默的道钉》(黄安年著，汉译英，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年版)。参编：《亚太主要国家历史与文化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世界历史》、《南开学报》等杂志发表论文十几篇。

**李莉**，女，1980年11月生，山东淄博人。2008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开设本科生课程“世界史专题”，主要从事美国城市史研究。曾在《史学理论研究》、《东南学术》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

**陈海宏**，1951年8月生于北京，河南省襄城县人。1969年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1971-1973年为济南红旗动力机械厂翻砂车间工人，1973-1975年在山东省电力学校锅炉专业学习，1975-1978年在山东辛店电厂锅炉车间当检修工，1978年从工人直接考上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刘祚昌教授。1981年获硕士学位，1981年至今在山东师范大学任教。1997年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首位高级访问学者，2001-2002年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赴美作学术访问。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教授、博导、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世界史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美国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Syracuse University, Weber State University 的高级访问学者。主要从事世界史和美国史的教研工作，专攻美国军事史。现已发表专著 3 部、译著 10 部、主编或参编 12 部，各种文章 70 余篇。曾获国家优秀教学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山东省优秀教学一等奖，是国家重点课程的主讲人和国家级教学团队骨干。两次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出版资助和霍普金斯大学的科研资助。

**周祥森**，1965 年 12 月生，浙江江山市人。1990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获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任职于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出版《史学的批评与批评的史学》、《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等著作。

**孟庆龙**，1964 年 1 月生，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图资室/世界历史数字化研究部主任，中国社科院图书系列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研究领域为美国史、国际关系史及世界现代史。主要学术专著有《世界瘟疫史》（合）、《英美新殖民主义》（合）、《国家安全：美国的两次“红色恐慌”》（合），主要论文有“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冷战外交探析”、“朝鲜战争中的美国停战谈判决策”、“美国对华政策中的苏联因素”、“华盛顿难辞其责——珍珠港事件再揭秘”、“炭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使用及其历史影响”、“一场特殊的心理战：20 世纪 50 年代台海危机中美战略解读”、“从世界历史看当前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等。另有译著（合）和编著多部。科研成果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二等奖。

**金卫星**，1958 年出生，回族，江苏镇江人。1982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 年 6 月本科毕业于苏州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90 年 6 月研究生毕业于苏州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专业，获硕士学位；2000 年 9 月入选为中美政府文化交流富布赖特研修学者，在美国纽约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 New York）研修一年。1983 - 1999 年任教于江苏省镇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1999 - 至今任教于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任教授。现为世界史学科带头人，《中学历史教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世界史学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和近现代中外关系史。先后主持完成五项省教育厅社科研究项目，一项国际文化交流项目；出版学术专著 1 部，主编、参编全国统编教材及省级教材 6 部，并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月刊》、《史学集刊》、《江海学刊》等国内权威核心期刊及其他期刊发表论文 60 余篇。多次荣获高校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和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其中个人主持的《世界近现代史》课程建设，获 1997 年江苏省普通高等院校二类优秀课程奖；论文“美国对德绥靖的‘韦尔斯计划’”（载《历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获江苏省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论文“略论宗教在美国城市化中的作用”（载《世界历史》1997 年第 6 期），获江苏省高校第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论文“美元的崛起与欧美经济民族主义博弈”（《世界历史》2008 年第 4 期）获苏州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专著《从“门户开放”到世界贸易组织》（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分获苏州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江苏省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个人于 1994、1996 年度两次被评为江苏省普通高等院校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胡国成**，1949 年 2 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

史系。1993年起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研究》杂志副主编、《商业评论》杂志总编、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著有《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出版)、《美国现代化工之父——杜邦》(兰州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1世纪的美国经济发展战略》(合著,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战后英国外交史》(合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等专著,以及论文多篇。译有《日本为什么“成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美国总统轶闻大观》(合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杜鲁门传》(合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合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等。

**胡锦涛**,女,1963年12月生,浙江乐清人。1995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开设的本科生课程有世界现代史和美国史等,研究生课程有美国近代史和美国族裔史,主要从事美国黑人史研究,曾于2001-2002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从事一年相关研究工作。曾在《世界民族》、《美国研究》等刊物上发表相关论文。

**赵志辉**,1965年9月出生,安徽省淮南市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2001—2003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工作,曾在安徽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工作,现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教授、副院长兼历史系主任。研究领域为美国外交史和中美关系史,目前正在从事罗斯福对华思想和外交思想研究。曾在《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开罗会议新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对华思想》等论文,2001年和2006年两次获得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出版专著《罗斯福外交思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战时美国对中国的大国地位政策思想研究”。

**赵学功**,1966年12月生,河北枣强人。1984-1991年在山西大学历史系读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1-1994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读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现为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1998年11月-1999年1月、2008年3-6月两度在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从事研究。1999-2000年作为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和国家档案馆从事美国与东亚关系史研究,并先后获得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约翰逊总统图书馆和福特总统图书馆研究资助,在三家图书馆收集有关资料。2004年6-8月,在香港大学美国研究中心进行短期研究。2002年入选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近期主要著述包括:《当代美国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巨大的转变: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十月风云:古巴导弹危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等发表论文60多篇,2004、2008年两次获得天津市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2009年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原祖杰**,1963年8月生,山东莱州人。1985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88年获南开大学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硕士学位;1988-1994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研

究所任教；1994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美留学，2002年获明尼苏达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2002-2004年先后在美国西南大学（Southwestern University）和北密歇根大学（Northern Michigan University）历史系任教。2005年起任四川大学教授。2006年至今任《中国历史学前沿》（*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执行主编。曾在《世界历史》、《历史研究》、《美国研究》、《史林》等刊发表文章二十余篇。为《加拿大通史简编》副主编和主要作者，《美国历史百科辞典》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社会与文化史、美国外交史、中西现代化比较等。

**高国荣**，1973年3月生，湖北汉川人，史学博士。1998年以来，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为副研究员，任《世界历史》编辑部副主任。主要研究方向是美国环境史。2002年7月，曾赴美国耶鲁大学参加雅礼协会暑期研讨班；2007年1月至2008年1月，在美国堪萨斯大学进修环境史；2009年8月曾访问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曾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美国环保运动与环境政策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环境史研究与20世纪中国史学》、福特基金会资助课题《中美两国荒漠化起因比较研究》等。

**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学科第1至第4届教授委员会委员，2004年期担任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美国社会史——包括美国移民史、人口流动史、城市史和人力政策史的研究。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重点基地项目和新世纪人才项目等6项，出版专著4部、编著2部，参编1部，在《美国历史杂志》、《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和《美国研究》等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40篇，多项成果被《新华文摘》和《高校社科文摘》等刊物转载，有十余项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学术奖励。2007年入选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工程，2008年荣获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技术人才奖。

**黄贤全**，1964年生于成都。1988年在山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随即到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2004年被评聘为教授。现任重庆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副院长。在教学方面，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世界近现代史方向的多门课程，如《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西方政治制度史》、《美国史研究专题》等。在学术研究方面，曾对美国文官制度的演变过程进行过研究，在《新华文摘》等杂志发表10余篇专题论文。近些年，着重研究美国区域经济开发，在《光明日报》、《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10多篇研究论文。近些年主持有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美国政府开发落后地区的模式研究》（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历史上的区域经济开发模式研究》（2006年）。

**董小川**，1951年10月生，吉林长春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史系主任，党支部书记。1968-1973年知识青年，1973-1976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76-1984年作为长春市第二实验中学的教师，1984-1987年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成为历史系教师。期间于1988-1990年在东北师范大学与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卡本代尔分校联合举办的国际关系研究班学习。1989年11月16日-12月21日，作为访问学者访问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1996-1997年，作为富布赖特研

究学者访问美国密歇根大学，2003年1-6月作为访问学者访问美国威廉玛丽学院，2009年12月-2010年1月作为访问学者访问美国莱斯大学。现为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吉林省历史学会会员。承担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科研基地项目和省部级项目多项。主要专著有《美俄关系史研究》、《美国文化概论》、《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现代欧美宗教多元化的历史与现实》、《20世纪美国宗教与政治》。主要译著有《巴黎城市史》、《玻利维亚史》、《埃塞俄比亚史》等。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

**韩毅**，1958年10月19日生。辽宁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美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全国外国经济史学会会长，世界近代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辽宁省历史学会秘书长。迄今已撰写出版了《美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607-1988》、《美国赶超经济史》、《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八卷（校订）、《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研究——理论、方法与问题》等10余部学术专著和译著。在《中国社会科学》、《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研究项目和省部级科研项目20余项，获得各级奖励12项。担任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外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主编。

**韩宇**，1972年1月生，辽宁新宾人。1999年于东北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and 福建省社科项目各一项，曾于1997年和200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从事短期研究、2003-2004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研究工作。研究领域是美国城市区域史、美国经济史，著有《美国高技术城市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主译《林肯传——救赎者总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曾在《世界历史》、《美国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潘迎春**，女，1968年出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史教研室副主任。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主要从事美国史、加拿大外交史的教学研究工作，讲授《世界近代史》、《西方典籍导读》、《美国史》、《现代美国对外关系史》、《美国社会文化》、《简明世界史》等课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加拿大‘中等国家’理论的提出及其早期实践》。曾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进修一年，多次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系、美国耶鲁大学进行访问研究。现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

**戴超武**，历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冷战国际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和美国外交史。出版的著作包括《美国外交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在《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当代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等杂志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 本次理事会换届工作的一点感想

王 旭

本次年会的主要工作之一是理事会换届。这次在理事改选的同时，也要改选研究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以及秘书长，因此是一次大换届。令人欣慰的是，在秘书处和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这次换届工作顺利进行，可圈可点，值得记录在案。

1、选举程序公平合理、有条不紊。理事会换届主要分理事会改选和新理事会构建，是件繁杂而精细的工作。理事会改选分酝酿提名和大会选举两个步骤。24日报到当晚，就开了一次理事会议，讨论会议议程和理事会换届的基本原则和操作流程。25日各组学术讨论后，专门抽出时期进行理事酝酿提名。当晚再次召开理事会，根据各组提名情况，商定获得两个组以上提名者可以成为理事候选人，依据这个原则拟定候选人名单（共39名，其中，原理事会成员获提名的30人，另增9名新候选人）。26日上午11时，开全体会员大会，先由各候选人做简要自我介绍（未到会者由秘书处或相关人员介绍），以便会员有个基本了解。之后无记名投票选举，选出37名理事会成员。为节省时间，投票后的计票工作放在中午，选举结果在午餐时宣布。宣布后，新理事会立即进入工作状态，午餐后召开第一次例会，进入新理事会构建阶段。

例会先由李剑鸣代为主持，他提议由王旭接任理事长，这个提议得到新理事会的普遍赞同。随后，会议主持交由新任理事长王旭。新理事会必须要完成的工作是选举产生常务理事会和研究会理事长、副理事长以及推举秘书长。在正式投票前，理事会对于选举标准进行讨论并大致有了一致的意见，即：常务理事，一要看对研究会工作的投入，二要考虑单位和地区分布，三要看学术水平和影响力；至于副理事长人选则更看重第三条。第一轮投票选举常务理事，在此基础上，再选举产生副理事长。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各项程序均顺利完成。

2、原理事长李剑鸣主动引退，做出表率。李剑鸣教授早年在南开秘书处期间担任常务副秘书长，1996年起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为我会的发展做出了大量工作。2002年起担任我会理事长后，更是为我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这次换届，他还不到50岁，就退出学会负责人的位置，在我国历史学界，恐怕还没有先例。其实，早在2008年武汉年会前，李剑鸣就表示退下来，只是当时修改研究会章程，没有换届。此次他不仅坚辞理事长，而且也表示不再担任理事，那么，如何发挥他在研究会的作用和学术界的影响力，成了新理事会讨论的一个主要议题，甚至占用了新理事会会议的大部分时间。最后，会议通过决议，聘请他担任研究会顾问。类似情况还有北京大学王希教授。王希是我会的老会员，在海内外的学术影响有目共睹，而且也是海外学术界在我会理事会的唯一代表。但在其一再坚持下，未入选理事会，如何发挥他的作用，也是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最后也是聘请他担任我会顾问。

这些做法在研究会历史上都是破天荒的事情。所谓顾问，是带有一定荣誉性质的头衔，一般都是有资历且年龄较长者担任。但此次李剑鸣和王希等中青年学者入选，学术

顾问的实质性色彩更浓。

3、研究会领导层“瘦身”。我会领导层从1979年创建起即为一正三副，到1993年方增加到一正五副，但2002年一度骤增到一正八副。此次是否沿袭这个数量抑或调整，是新理事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树立研究会在学界的良好形象，防止出现某些研究会那种分摊席位的情况，理事会最后一致同意将领导层人数由9人压缩到7人，一正六副。尽管总数压缩，但最后经无记名投票产生的副理事长，仍有2位新面孔。他们年龄轻，精力旺盛，正处于学术发展的高峰期。常务理事会有较大的调整，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基本反映了国内美国史研究的区域特点。

4、秘书长人选另辟蹊径。理事会考虑到，秘书处现在厦门，如果在其他地区选任秘书长，不便开展工作，秘书处和秘书长在一起是最理想的设置。目前看，理想人选是原副秘书长韩宇，但美中不足的是韩宇尚未晋升为正教授。不过，我会历史上曾有副教授担任秘书长的先例。综合考量之下，理事会一致通过了这个提议。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新秘书长就任后，秘书处工作有新的起色，面貌一新。例如，在得到杨生茂先生逝世的消息后，秘书处就在第一时间通过电子邮件向会员通报，并在网站上设立纪念杨生茂专栏，走在其他网站前面。广大会员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数量空前，确实达到了缅怀先辈、激励后学的作用。

理事会一致希望秘书处继续设在厦门大学，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目前秘书处设在厦门大学已8年，积累了一定管理经验，处于最佳状态：韩宇工作认真负责，肯于奉献，在秘书处工作、尤其是网站建设上功不可没；胡锦涛经验丰富，办事踏实稳妥，与顾问和很多老会员都有固定联系；李莉人勤手快，办事干练，作为兼职秘书能够独当一面；盛嘉虽不是秘书处正式成员，但经常为秘书处工做出谋划策，有独特贡献。他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担任某社团负责人，阅历丰富。从年龄上看，这几人恰巧分别是50后、60后、70后和80后，年龄结构井然有序。其共性特点是有奉献精神，对秘书处工作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此外，美国史专业现有的博硕士研究生也承担了研究会网站更新（几天就更新一次）和编辑《通讯》等大量具体工作。可以相信，秘书处工作会在已有基础上，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 如何开好年会的一些建议

编者按：我会顾问、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王希在此次年会后，专门致信王旭理事长，对年会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现转录于下：

王旭理事长及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美国史研究会 2010 年会开得十分成功，这与你们精心的设计与周到的安排是分不开的。厦门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和老师（还有你的夫人）为这次会议做了大量的工作，服务非常的周到、仔细，这是有目共睹的。厦大的校园更是令人着迷。在我看来，唯一能够与之媲美的是加拿大的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的校园。

就我个人的收获而言，我从会上的发言和讨论中学到不少的东西，并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和教学的一些情况，认识了一些年轻的学者，了解到他们的研究课题。比起我们这一代人起步的时候，新一代学者有更好的知识结构，语言能力更强，更加善于学习，而且具有真正的国际视野，这一点令我感到很振奋。

与此同时，我也想对未来的年会提出一些建议。

一是小组会的组成可以考虑以主题（theme）为组织基础，这样可以将研究相近的文章集中起来，对作者和听众都会是一种提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鼓励会员自愿组成小组，但秘书处应做出相应规定（如一组文章最多不能超过 5 篇之类）。小组会的文章一般不应超过 4 篇，多了大家根本记不住，而且效果不佳，时间也以最多 2 小时为好。

二是最好能够至少提前 10 天将文章提交给评论人，使其有机会做准备，给出有质量的评论。（我们目前会议的评论大多是总结性的发言，因为文章太多，无法展开专业和深入的评论，作者的获益十分有限，听众也觉得评论人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与之相关的是，大会的总结发言似乎也可采用简报的形式，不必占用如此多的会议时间。

三是增加关于教学的小组会和讨论。即便是年轻学者，他们的主要任务仍然将是教学，所以，年会如果能够提供一些平台，供大家交流，会提高美国史教学的质量，对整个世界史教学质量的提高也会有促进作用。

最后一点，选举理事等活动，应该安排在晚上进行，尽量不要占用白天会议的时间，应留出充分的时间来交流学术。关于理事会的组成，可否考虑一个“民主-集中-再民主”的做法，即先征求会员的意见，提出候选人，然后由理事会根据地域、专业、年龄、为学会服务的业绩、性别等因素来提出一个综合的差额候选人名单，并事先征求提名人是否同意被提名的意愿，在这个基础上，再以会员大会的方式进行选举，产生理事。差额度应该更大一些，而且应该有更大的年轻会员的比例，甚至可以规定理事任期不得超过 4 届等，这样可以加速年会的新陈代谢，吸引新生力量为学会工作。（我之所以请求大家不要选我当理事，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很高兴，大家能够尊重我的个人意愿）。

再次对你和秘书处邀请我参加会议表示感谢。今后只要有需要我会学会工做出力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祝好！

王 希

## 庆贺黄绍湘顾问九十五寿辰

### 绚丽多彩的人生

——访中国美国史奠基人黄绍湘先生

顾 宁

在五月的一天下午，我来到黄先生刚刚搬入的新居进行采访。黄先生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黄先生的新居虽然还没有收拾好，但明媚的阳光透过硕大的玻璃窗，照在黄先生慈祥的脸庞上，使黄先生看上去不像是 95 岁高龄的老学者。

透过她深邃的目光和坚毅的神态，我可以领略到她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思索为之倾注一生心血的美国史研究；感受到她笔耕不辍的精神。通过她侃侃而谈，我可以领略到这位美国史研究老前辈执着和严谨的治学风格。下面就是我们的对话。

#### 一、黄绍湘先生绚丽多彩的人生道路

顾宁：在您 90 余年曲折而有意义的人生中，有哪些事情曾经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您曾讲过在您的一生中有三个转折点，这三个转折点都是哪些？

黄先生：一个人的生命航程充满前进的颠簸与风险，总有几个转折点作为标志。我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是与封建官僚家庭决裂。第二个重大转折点是在清华大学参加了“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加入共产党。第三个重要转折点是赴美留学，并在学成后回国，报效祖国。

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和官僚家庭走不同的道路。

我于 1915 年 5 月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曾祖父黄道让著有《雪竹楼诗稿》等，在家乡颇有名气。我的父亲黄右昌，曾留学日本，专精罗马法，并且擅长书法。此外，他还以专门为梅花赋诗而见长。1917 年 11 月，黄右昌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成为北京大学法科教授。他因对“西方现代文明之母法”罗马法研究推广成就卓著，有“黄罗马”之称。

我的童年是在北平（现名为北京）度过的，当时父亲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后来还当过系主任。所以我在北平上了小学和中学。1930 年的夏天，我父亲辞去了北大的职务，举家迁往南京，就任国民党政府大法官和立法委员。我当时年仅 15 岁。作为女性，由于在家里饱受歧视，我不愿再这样下去，所以拒绝随父母南迁，坚决留在北平读书。这便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此后，我先是在师大女附中上学。由于该校被接管，在老师的鼓动下，我与其他同学以转学来抗议接管。后来我考入北平私立笃志女子中学，插班进入高一就读。由于对校方强迫学生作祷告、每日要参加谢主宗教仪式不满，我准备另行择校。此时，母亲来北平照顾得伤寒的大姐。在母亲的压力和强迫下，我不得不放弃自己从小喜欢的理科，考入号称毕业后会有“铁饭碗”的国立盐务专科学校。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我参加了北平学生支援南下代表的卧轨请愿活动。这一

时期我的思想很活跃，广泛阅读了左翼文学作品，作家包括（前苏联）托尔斯泰、高尔基和普希金，（英国）莎士比亚和狄更斯，（德国）歌德和海涅，（美国）海明威、马克·吐温和斯坦贝克，（法国）罗曼·罗兰，知识面很广。同时开始大量阅读左翼进步书籍，接受“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在专业学习方面，我所修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历代盐法、统计、会计等课程成绩名列前茅，被选为班代表。此外，1934年春，我代表全班同学向校方提出撤换不称职的教员，校方不从，我反而被记了两次大过。全班同学为我声援，要求撤除记过处分，但遭到校方申斥。为此，我愤然离校。我从小就向往上清华大学，父亲的学生、时任北京大学法学系教授秦瓚为我在短时间内提高英语语法、修辞和写作水平，对我严加指导、严格批阅我的英文作业。由于准备充分，我竟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插班进入外语系二年级学习。

我“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是在清华大学。虽然我在清华学习了仅仅三年，但是由于受到中共地下党的影响，我以高度的热情参加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在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顾宁：根据清华大学校史材料，当时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草拟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震撼人心的吼声，疾呼“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我们的目标是同一的：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民族！我们的胸怀是光明的：要以血肉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还有，据何礼先生回忆，“1936年10月间，各校公开的代表聚集在燕京大学礼堂开了“北平学联第一届成立大会”。何礼、王永兴(黄刊)还有您被清华全体学生通过大会推选为代表，代表清华学生救国会参加学联。1936年10月到1937年7月“召开的‘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第一、二届代表名单(大学部分)如下：……清华大学：王永兴、黄绍湘(女)、何维登(何礼)、孙世实、李忻、赵汝洵(赵石)。”您当时具体组织和参加了哪些活动？

黄先生：“一二·九运动”是指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学生中爆发并迅即传播到全国的学生救亡运动。这场运动从1935年12月9日持续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学生救亡运动。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运动回忆录》一书收录的“华北学生献旗团赴南京请愿经过”一文中谈到了这一运动的历史过程。蒋南翔同志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他亲自起草了著名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个宣言及其它重要历史文献，……。具体史实可以看我写的回忆文章。1936年春，我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在高碑店遭到军警镇压，我奋不顾身，用木柄与军警搏斗，当时在高碑店的火车站上，全团团员慷慨激昂，高唱救亡歌曲，誓为中华民族解放奋斗终生。“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于1936年2月1日在北平正式成立，它是抗日民主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改名为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也成立了分队。我回到北平后，便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最早的一批“民先”队员。就在同一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我年轻时，很活跃。不仅能在文艺舞台上演话剧，还是出色的演说家，鼓动救亡、宣传抗日。与此同时，我还担任救国会刊物《觉报》的主编，深受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牛荫冠的器重。我曾在回忆“一二·九”运动的文章中说，记得1937年1月底，由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不公开的北平学生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蒋南翔、杨学成等同志，

在北平学联对我们作过西安事变后的形势报告。北平学联公开出面和华北各地学生团体联系，领导和组织这一工作。经过积极筹备，华北学生献旗请愿团在2月4日正式成立了。因我当时是清华救国会派赴北平学联的代表，在北平学联兼职担任交际（即统战工作），一直作公开工作，在南京还有旧的上层社会关系，北平学联地下党组织指派我担任献旗请愿团的团长。我代表献旗请愿，要求“团结御侮”，“一致对外、全面抗战。”我们一行20人抵南京后，即被国民党当局军警软禁。我挺身而出，带动全团成员据理力争，申明此行目的是争取国内团结抗日，爱国无罪。在我们回北平后（是在记者招待会前，还是在招待会后，确切时间大家都记不准，但对下面提到的事都记得），北平学联在西直门内东北大学广场上召开一个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我在大会上作了汇报，以我们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继续阻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反共的政治主张，对献旗请愿团行动进行封锁、威胁、软禁等实际情况。当时还没有“麦克风”，我讲得声音沙哑，喝了些生鸡蛋润润喉咙，再继续发言。详细情况，我曾写了专门的回忆文章。

我“人生的第三个转折”是赴美学习美国历史，这段难忘的经历，奠定了我一生走治学之路、成为专门研究美国历史的基础。我在《黄绍湘集》（以下简称《文集》）中谈到，当时去美国是受党的培养。这段经历在下面还会谈到。

顾宁：1935年，山东发大水，您当时成为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是不是在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成立的？您当时还不是党员，为什么会参加这个委员会？

黄先生：1935年秋，山东发生大水灾，北平地下党组织发起开展救灾活动，召开了北平各校救灾代表大会，成立“山东水灾赈济会”，清华学生姚依林（姚克广）被选为秘书长。在清华也成立了赈济会分会。在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公开合法的形式，进一步团结了广大中间群众。同时，成立了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救国委员会是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积极分子都可加入，不一定要是党员）。委员有黄诚、吴承明、陆瑾、华道一和我等11人。在此基础上，11月18日，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秘密的“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学联总部设在清华园。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有这方面的专题报导。

顾宁：根据史料，您在1938年回到故乡，在常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抗敌工作团。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做了哪些具体工作？

黄先生：1938年春，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回到常德，与进步青年周艾从、王泽民等，发起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抗敌工作团。这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发动抗日宣传。关于常德的抗日情况可以从中共常德地方志中看到。当时常德中学进步同学殷廷禄、马文馨都是骨干。殷廷禄后来成为地下党员。我在常德中学进行宣传、组织活动时，是住在马文馨（女）家。我离开后，马文馨家被抄。我从常德撤退到长沙，在张治中当权时期，长沙较进步文化抗敌后援会还有吕振羽和翦伯赞，我和他们共事受益很多。

顾宁：在您年轻的时候，女大学生是很少的，上清华大学的更少。为什么选择上大学而没有去解放区参加革命？

黄先生：上大学时，还没有参加革命。参加革命后，就得根据斗争需要，服从组织安排，不是自己选择的问题。我于1937年6月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获得学士学位后，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从1941年夏天开始，我参加了由毕季龙、潘菽等20余人组织的秘密读书会，共同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

顾宁：有人称您是“战士，也是学者”。您认同这个说法吗？作为一个老革命，同时又是一位著名学者，您是如何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的？

黄先生：从战士和学者角度讲，其实，在美国学习期间，我是受美共中国局领导，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一些政治活动。1945年4月，董必武代表中国解放区赴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大会，我曾为董必武担任翻译。他在纽约停留期间，曾向华人介绍中国解放区的情况，那场集会遭到在美国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围攻。我、陈善祥和其他中国进步留美学生为保护董老的安全，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此外，1945年夏天我在纽约曾应美国进步友人史沫特莱的邀请，为她撰写《朱德传》翻译过关于湘鄂赣边区的战士和人民抗日军队在敌后状况的小册子和与朱德有关的苏维埃政权的事情。我还参加过她和林语堂就中国民主问题、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召开的辩论会。她逝世时，我曾写文章悼念她。为了反对美国杜鲁门总统支持蒋介石搞内战和反对共产党的作法，我还和其他中国进步学生以个人名义给杜鲁门写信，刊登在1945年6月的报纸上，要求美国从中国撤军和推迟为蒋提供贷款。

我曾经在《文集》“序言”中说，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文选，记录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在美国史研究领域艰难跋涉的历程，……。我在美国仅仅学习了两年，从那时开始，我便开始了艰难的学术跋涉。作为一个学者，直到今日，仍然坚持看书，写文章，进行研究。我永远记得，我是党培养的学人，我首先是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因此，不仅在治学中尽自己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也要跟错误的思潮作斗争。这也是一种战斗，当然跟革命时期与敌人的战斗不同，这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摆事实、讲道理来说服人，同时也要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要展开学术争论，这对提高我国美国史的学术水平是有好处的。

## 二、黄先生的治学道路和感悟

顾宁：您为什么从清华的外文系转到历史系学习？

黄先生：我在清华大学学习了三年。第一年学习英文，成绩优异。在那时接触到（英）狄更斯的《双城记》、（美）霍桑的《红字》和惠特曼的《草叶集》等外国名著。在文学的海洋中，让我流连忘返。此外，我还选择法语作为第二外语、日语为第三外语。但是，日本的入侵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感到学习文学远没有研究历史对中国民族兴亡的贡献大。1935年夏，我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文学，转到历史系学习中国近代史，希望从中找到挽救中华民族的办法和契机。在历史系，我选择了吴晗教授教的明史，一是因为明史最接近近代，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与我已经学过的中国历代盐务制度史可以衔接上。二是，面对当时严重的民族危机，应该研究中国近百年来屈辱的历史，这符合自己探寻中国积贫积弱受列强压迫原因的初衷。由于学习刻苦，我很快就成为了历史系的优秀学生，得到蒋廷黻、雷海宗两届系主任的赏识。与此同时，我还以满腔热情投入到清华救国会的活动中。当时校方决定，凡担任救国会委员一任就要记大过一次。党组织考虑到我的处境，在我担任两届委员后调我到妇女识字班工作，从而使校方没有借口给我记三次大过并开除我的学籍。由于吴晗教授同情并理解我的经历和抱负，建议我将在国立盐务专科学校学的“明代盐法”论文加以修改充实，作为毕业论文。我是在一边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一边学习明史等课程的情况下，于1937年完成清华大学学业，获得学

士学位的。

顾宁：您为什么选择到美国学习？在美国为什么没继续学习明史而选择了美国历史？

黄先生：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英美盟军也逐渐走向优势。是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举办第一届自费留学考试。中共中央南方局认为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必然大大提升，并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决定安排人赴美进行学习、研究。南方局的罗清同志鉴于我在搞地下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教英语，便鼓励我参加出国考试。我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各项考试。当时政治环境险恶，我丈夫毕中杰也是地下党员，还要照料一个4岁和一个2岁两个幼女，我在南方局领导的支持和组织的资助下，毅然赴美学习。

1944年8月，抗日战争还在激烈地进行，而我却离开了遍体鳞伤的祖国，从重庆出发，搭机飞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再换火车至孟买，乘美国运输舰。历经40多天的艰苦行程，最终抵达美国的旧金山。然后我又横穿北美大陆，到达美国东海岸的纽约，进入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主修美国史。

顾宁：您是自己选择上哥伦比亚大学的吗？您在美国学习的最大收获是什么？

黄先生：可以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学习美国历史，是受到党的培养。在美国学习期间，我同时在美共中国局领导下为党工作。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的最大收获是：当时该校是美国盛极一时的进步史学派的主要阵地（这也是为什么我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进步学派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本质性区别，然而这一流派采用了经济解释方法来解释美国历史和分析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时还注重分析社会矛盾与冲突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这些分析历史的方法在国内学习是没有遇到的，使我获益匪浅。教师授课的方法也与国内不同，以课堂讨论为主，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各抒己见，课堂十分活跃。为了克服学习困难，我采用在清华复习西洋文学史时使用的方法，蚂蚁啃骨头，一点一点由浅入深，逐步弄通美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和事件的前因后果。积极参加课堂研讨活动，一方面提高口语水平，另一方面提高思辨能力。在学校时，阅读了大量进步学派的专著，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对史实加以分析。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威廉·麦克莱的政治哲学思想”（注：麦克莱是一位杰斐逊民主主义者），论文的指导教师是约翰·克劳特，他是一位进步派学者。对我的论文，他认为是一篇“倾注了深邃的思想”、“写得非常好”的论文。评价比较高。毕业以后，我有机会在耶鲁大学讲授中文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当时国内内战全面展开，所以我在1947年春天毅然决定回国，放弃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优厚待遇。另外，在哥大学习期间，我还到纽约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主办的杰斐逊社会科学院进修美国工人运动史、黑人运动史等课程。

顾宁：您曾说过，“两年多艰苦而愉快的学习，奠定下40多年来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基础。”仅仅两年的时间，您却在掌握了美国通史（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史学史（史学流派）、专题研究（包括人物和事件）等多方面的知识，在回国后写出中国第一部美国历史专著，并在1953年出版。学界泰斗陈翰笙先生对该书的评价是，“这部‘美国简明史’是我国解放后史学中第一部关于外国通史的著作。其内容、组织和笔调都很好。附录的四种材料都切合实用，其中作者精选的‘参考书目’尤为出色。这部有价值的历史

著作是值得向读者推荐的。”此后，1957年您又推出了《美国早期发展史》。这两部著作被称作是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著作”。在张宏毅教授的文中，有中肯评价。您可以讲讲当时写书的状况吗？

黄先生：我在1947年春回国时住在青岛，使用从美国带回的大量书籍、资料，潜心从事《美国政治经济史》的研究与写作，同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我先在山东大学任教期间仍继续进行写作，基本完成了史稿。1951年7月我调至北京中央人民出版社任编审。当时正值抗美援朝高潮，一方面恐美、崇美、亲美思想严重，另一方面又有由于仇视美帝而简单化的问题。我深感有必要通过美国史让人们认清是非，于是一面审稿，一面根据出版总署建议将原有史稿改写为《美国简明史》。我记得初稿写成后，出版社曾请陈翰老审稿。他看了后认为很好，并提了150条小的修改意见。历经多年辛劳，《美国简明史》终于在1953年问世并由三联书店出版。该书共36万字，涵盖从17世纪北美殖民地时期到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史。《美国简明史》当时深受读者欢迎，记得我还为军事学院、外交学院等单位作了学术报告，并针对当时的一些“左”的、简单化地评价某些美国历史事件的现象撰文指出错误。此后，我又开始着手撰写《美国早期发展史》，该书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都成为大学历史系教员和学生的必读书，并为我国外交、军事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顾宁：陈翰老除了对《美国简明史》总体评价外，还对您的著作中涉及的具体史实，特别是“罗斯福新政”做出客观评价。回顾陈翰老的话，您今天有何感想？

黄先生：当时陈翰老凭借着他敏锐深邃的历史、经济史观，赞成我对美国历史的分析，对我的专著给予了客观、高度的评价。50多年过去了，重温陈翰老的评价，看到国内个别美国史学者虽然深受人民的培养，却对美国当权者一贯的霸权主义视而不见，一味过分夸大“罗斯福新政”的作用，不知他们的公正和良知到哪里去了？！陈翰老的评价，在他1954年写的书评中可以看到。

顾宁：听说在“文化革命”期间，您的书稿和不少书被造反派抄走了，也没有发表任何论文。在那个年代学校都关门了，“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但是您还是没有放弃对美国历史的思考和研究。在粉碎“四人帮”后，先于1979年推出《美国通史简编》（对《美国简明史》一书的修订），有人评论说，《简编》是一本“功夫很深的巨著”。邓蜀生先生评论说：“《简编》有它自己的严谨体系，论点前后呼应，贯串始终”；有人称该书“着重阐述了人民群众在创造历史中的巨大作用”；还有人称“《美国通史简编》是美国史走向繁荣的第一部代表作”。该书还曾被誉为了极具标志性、代表性的美国史专著，开创了改革开放时期美国史研究新局面。在1987年您又出版了《美国史纲(1492—1823)》（对《美国早期发展史》的修订）。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使您有毅力在那样的年代对已经出版的两部著作进行全面的修订？

黄先生：由于我感到已出版的两本书，还有许多不足，早就打算修改再版或另出新书，因此随时注意收集资料。文革之前，我已收集了很多，可惜文革抄家时，被红卫兵用三个麻袋抄走了，全都丢失了。当时感到自己的任务没有完成，因此在强迫劳动之余，又偷偷收集资料，记在许许多多的小纸片上。文革一结束，乘自己记忆犹新，就根据这些小纸片，只争朝夕地进行整理，可以说是久蓄待发，最终又出了两本书。

顾宁：您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美国历史研究，杨生茂教授称，“在国

内谈到研究美国史，还当首推黄绍湘先生，她是第一位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研究的。”国内现在有一种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过时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先生：由于自己青年时期即对共产主义抱有坚定的信念和理想，我在学习、学成回国、新中国成立直至今日，始终如一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典著作，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美国历史各阶段的实际，进行钻研、探索和表述。对主要美国史学流派，从史料到观点进行鉴别、筛选，不囿于一家之言。我1984年发表在《兰州学刊》增刊上的《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一文，讲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美国历史的问题。我认为，“开创美国史研究的新局面”要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入手，以加强和提高在美国史研究中的鉴别能力、分析。我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的内涵，是适用于研究美国历史进程和社会现实的。我在《文集》中说，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必要时也开展争论。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我觉察到，有一段时间，社会上确实有一种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已经过时了的思潮，在美国史研究上也不例外。根据我的信仰，我义不容辞地与之进行了极为艰苦的学术争论，我的《文集》中就有好几篇。可惜，当时谁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被攻击为“政治僵尸”，“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者”。对于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与人为善的学术争论的作法，我感到很痛心。

顾宁：您不但在美国早期史方面堪称中国研究美国早期史和美国通史的鼻祖，而且还重视现代史的研究和美中关系史研究，您还可以谈谈为什么要涉猎这么多方面？

黄先生：研究美国历史应该把握美国历史全貌的宏观研究，同时也进行重要的专题。我在改写《早期美国发展史》的同时，就将注意力转向美国现代史的研究，搜集50年代以后美国当代史史料。我很早就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感兴趣。我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史学者绝不满足于对一两个问题的实证考察，应该对美国史作宏观、整体的研究，揭示其发展规律；同时应该研究那些反映美国社会历史本质特性和必然联系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研究美中关系也一样，把握宏观和微观研究。

顾宁：您曾经想写《现代美国简史》，目前进展状况如何？

黄先生：我早在文革前就已注意收集现代史的资料，文革时也一起丢失了。这些年来，也收集了不少资料，也写了一些文章，收集在我的《文集》中。美国的现代史，尤其这些年来美国不断发动局部战争，想称霸于全世界，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原有写现代史的愿望，可惜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实在力不从心了，只能寄希望于像你们这样的后起之秀了。

顾宁：您因为在中国美国历史研究方面的卓越贡献，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79年成立时就当选为第一届理事长。“美国著名学术刊物《美国遗产》称，在‘中国，黄绍湘是美国史的主要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黄教授是美国史研究的拓荒者’。”作为美国史研究的老前辈和老专家，您认为社科院的美国史研究应怎样搞？

黄先生：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我由美国科学院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等单位安排，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知名学者，于1985年10月至1986年9月访问了美国。除了在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及耶鲁、哈佛、纽约州立大学等7所大学讲学访问、开展学术交流外，还在国会图书馆等地查阅书籍和资料。这些访问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在

美国史方面的开拓性交流。通过交流，美国学者对于我国学者在资料贫乏的情况下美国史研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颇感意外。我感到，那次交流也为今后中美史学界的学术交流起了铺路的作用。从社科院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我认为社科院的美国史应该是基础研究和政策研究共存。基础研究不能丢。基础研究搞扎实，才能搞好政策研究和提出可行的建议。

### 三、黄先生一生所坚持的做人、做事、做学问原则

顾宁：您一辈子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原则是什么？

黄先生：做人要有理想。人活着就是为了自己追求的那个理想，而且要锲而不舍。做事、做学问的话，也一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多年来，我治学力求严谨，行文朴实，从而适合广大读者的阅读。我现在虽然年高体弱，但仍坚持学习，坚持思考，笔耕不辍。史学家要在重大历史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见地，要视野开阔。

顾宁：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您对年轻一代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研究人员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黄先生：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年轻人接触到了各种美国现象，从而不少人“崇美、亲美”思想又复萌了。作为美国史的年轻学者，除了要吸取美国先进、值得我们借鉴的一面；但也一定要从现象认清本质，批判其不好、甚至反动的一面。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任重而道远。我希望广大的美国史中、青年研究工作者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写出有中国特色的美国史研究著述，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研究历史，尤其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要站稳科学的立场，决不可以牵强附会，曲解历史。研究美国历史，还应该了解美国的史学流派。

顾宁：您曾讲过“改革开放以来，美国史研究逐渐成为世界史学科中的热门课程，思想活跃，论证迭起。”但是就我所知，目前美国历史研究中，很多人不用档案和第一手史料写论文，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先生：美国史研究不能从原则出发，而必须建立在翔实的史实基础上，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指导，研究的结果也只能是罗列现象，漫无边际地积累史料，不分主次地把美国历史写成“流水账”。我曾经提出关于建立“健全的学风与学术研究规范”的意见。目前学术界丑陋现象泛滥成灾：如低水平重复、粗制滥造、抄袭剽窃、假冒伪劣、互相吹捧、形成宗派，不少书评已经变味，平庸的东西和学术泡沫太多。我认为在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应该健全制度规范，强化学风建设，净化学术环境。这样才能使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出好的、优秀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学术成果，更上一层楼。

顾宁：谢谢黄先生接受采访，也祝愿您健康长寿！

（转载自《学问有道『下』——绚丽多彩的人生——访中国美国史奠基人黄绍湘先生》，方志出版社2007年8月版）

本文来源：中国世界史研究网（<http://worldhistory.cass.cn>）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致黄绍湘先生的贺信

尊敬的黄绍湘先生：

适逢先生九十五华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向您表示由衷的祝贺！

先生是新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撰写了第一部美国通史，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首任理事长，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深得学界内外敬重和我会会员的尊敬与爱戴。尽管年逾九十，且眼疾缠身，先生仍关注和支持我会的成长，并积极为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献计献策。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代表本会全体会员和美国史研究的后生晚辈向黄先生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衷心祝愿黄先生吉祥如意、健康长寿！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10年5月10日

##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梁茂信教授贺信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欣闻我会顾问黄绍湘先生95华诞，值得庆贺。先生是我国的美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其《美国史简编》至今仍是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必读书目之一。先生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者之一，为其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此谨代表东北师范大学的美国所师生，遥祝先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延年益寿。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  
梁茂信  
2010年5月10日星期一

##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美国史研究中心祝贺黄绍湘先生九五华诞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

值此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黄绍湘先生九五华诞之际，请向黄先生转达我院全体师生的诚挚祝福：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美国史研究中心  
2010年5月10日

## 庆贺齐文颖顾问八十寿辰

编者按：2010年3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河北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聚会暨《美国史探研（续编）》首发式研讨会”。齐文颖教授曾任我会副理事长，我会多名会员参加了此次活动并发言。齐教授也对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我会会员在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聚会上的发言

#### 李剑鸣（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首先向齐老师祝贺八十岁华诞，祝齐老师生日愉快，健康长寿。齐老师是美国史的前辈学者，我刚开始学习美国史的时候，特别想投到齐老师门下深造。但齐老师是知名的美国史专家，再加上北大历史系门槛很高，所以我当时不敢动报考北大的念头。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齐老师在美国史领域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刚才马克垚老师说，齐老师在妇女史方面所做的工作具有开拓性，我觉得她在美国史领域同样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齐老师主要研究美国早期史，但美国早期史在中国长期不太受重视。直到今天，早期史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研究人员数量比较少，史学界的认可度也不高。其实，早期史在美国史学界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早期史的概念，早期史的研究范围、方法和材料，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美国，在英国，都出现了很多成就斐然的早期史学者。齐老师有出色的学术眼光，她的远见卓识，集中表现在她最早在国内建立了一个早期史学位点，培养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早期史研究人才。她当年指导研究生所做的学位论文，在今天看来都是早期史的经典题目。在美国早期史的框架结构中，那些根本的、重要的问题，齐老师的研究生一个接一个都做了。因此，把她的早年指导研究生做的论文排列起来，就是一部相当完整和系统的早期史重大问题的研究专辑。这个专辑早几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书名是《美国史探研》。这本书中有不少文章，在今天来看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美国早期史研究者必读的参考书。齐老师培养的研究生中，有很多人成了学术的栋梁之才，特别是像今天在场的满运龙兄和杨玉圣老师，都是学界特别景仰的人物。满运龙兄许多年前发表的文章，我们今天的研究生在课堂上还要认真研读。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齐老师在早期史领域所做的工作，影响是多么长远！我虽然没有正式入齐门深造，但实际上是齐老师的私淑弟子，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今天喜逢齐老师八十华诞，我们聚在一起向齐老师祝贺，主要是想表达一种敬意和谢忱。我们感谢齐老师在美国早期史领域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使我们至今受益，使我们的美国史学科能有今天的规模。再次向齐老师表达我的感谢和祝贺。

#### 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先向齐大姐鞠个躬，祝贺你八十华诞。

在齐文颖先生八十华诞前三天，齐门弟子和受惠于齐门的学子聚集于北大，回顾北

大齐思和、齐文颖两代美国史学研究者所走过了 80 年不平凡道路是很有意义的。2007 年 5 月,也是在这里举行了纪念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我们仿佛看到了北大学人 80 年来坚持不懈地从事美国研究的缩影。

历史评估需要时间的积淀,年长者研究历史往往具有这方面的年龄优势,一批年长的美国研究者,数十年如一日从事美国研究,“80 后”“90 后”学术老人迄今活跃在美国研究领域,不能不是我国美国历史研究者的一个可喜景象。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19 人组成的顾问团为例,除已故的刘祚昌、冯承柏、严四光先生外,迄今健在的 16 位中就有 7 位属于“80 后”学术老人,他们是刘绪贻先生(1913 年 5 月,97 岁)、黄绍湘先生(1915 年 5 月,95 岁)、杨生茂先生(1917 年 9 月,93 岁)、邓蜀生先生(1923 年,87 岁)、方生先生(1926 年,83 岁)、顾学稼先生(1927 年 8 月,82 岁)、齐文颖先生(1930 年 3 月,80 岁)等,张友伦先生和华庆昭先生明年 80 华诞,他们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宝贵财富。我国的美国研究队伍又是一支越来越年轻化的队伍,老中青三代人协同建设美国研究不能不是一个突出的特色。

今天的聚会使我们有机会探讨齐门老人对于北大美国研究的影响。这里谈几点个人感受:

#### 第一,北大有美国研究的传统

自上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迄今 80 年间,这个传统从未间断。齐思和老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自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祖国,他是我国第一位在美国学习美国史的哈佛博士,1935-1937 年,齐思和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和清华大学开设了美国历史课程,系统介绍美国历史及美国史学家的主要著作,这一课程为迄今所知在国内高校最早开设的,如齐文颖先生所说:齐思和先生“是在我国开设‘美国史’的第一人”。(齐文颖:勤奋·创新·爱国——纪念先父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文革后期的 1973 和 1975 年齐文颖先生等率先在北大为学员开设了美国历史课程(黄绍湘、齐文颖、杨立文、谭圣安、罗荣渠等先生主讲),1981 年上半年齐文颖先生等还组织北大外的美国史研究者在北大举办为期一个学期的美国史系列讲座,听课者有北大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 1977-1979 级学生、文科各系研究生和校外美国史同行,参加讲授的有唐德刚、杨生茂、张友伦、黄绍湘、黄颂康、邓蜀生、齐文颖等 11 人。1981 年下半年,齐文颖老师还在北大历史学系讲授美国史,系统讲授有关美国早期和近代的历史。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齐文颖老师在北大培养了第一批美国史的硕士研究生,先后培养的十几位弟子,迄今早已是活跃于美中学术教育领域的中坚力量。为北大历史系美国研究做出贡献的还有黄绍湘、罗荣渠、谭圣安、杨立文等教授。

我们欣慰地看到,今天北大的美国研究实力之强已为全国之冠,以历史系为例,李剑鸣、王希、王立新、牛大勇等教授在其各自研究领域独领风骚,北大美国研究领域并不限于历史系,还涉及其他与美国问题相关的系院所,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这些高端研究人才,合在一起为全国其他任何美国研究机构所不及。我们还欣慰地发现,今天北大历史系美国研究人才来源不限于本校培养、师生近亲薪火相传,而且扩大人才交流范围、开放引进高端人才,使得北大美国研究得以人才济济,并对于国内外美国研究学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在谈到北大具有今天我国美国研究一流基地时,要向为美国研究做出开拓性、奠基性贡献的齐思和老先生、齐文颖先生、罗

荣渠先生等表达我们的敬意。

## 第二，北大有美国早期史和早期美中关系史研究的传统

美国早期史是美国奠基时代的历史，也是美国研究的奠基性工程，做好了这项奠基性工作，将为我们的美国研究奠定良好基础，齐文颖教授和北大美国史研究者一起，在这一学术领域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把它作为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重新研究美国史的起点与重点，而且把早期历史作为美国历史的一个独立的重要阶段来看待，组织力量围绕早期史上的若干重点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如满运龙博士在《美国史探研（续编）》序中所言：“在中国，老一代学者（如黄绍湘教授、刘祚昌教授）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但主要是把殖民时期当成美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而非美国历史的一个独立学科来看待的。齐老师访美归国后，致力于美国早期史的学科建设，把殖民时期、美国革命时期和制宪时代打通，从而使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启了中国学者系统研究 17-18 世纪英属北美历史的先河。”黄绍湘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在北大任教，并于 1957 年出版了《早期美国发展史（1492-1823）》（人民出版社）。2001 年齐文颖教授主编的《美国史探研》出版，和 2010 年满运龙等编《美国史探研（续编）》出版则是美国早期史研究成果的集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新进展、新思路、新贡献，续编中有满运龙、陈勇、李剑鸣、苏鹿垒等人的八篇论述美国早期史的论文。在齐文颖教授深入开展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6 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其中第 1 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是李剑鸣教授多年潜心研究美国独立前近 200 年历史的心得成果，该书把习称“美国殖民地时代”概括为“美国的奠基时代”，该书的出版是我国研究早期美国史的新的丰硕成果。值得欣慰的是李剑鸣教授近年由南开重镇加盟北大历史系，为北大延续和发展美国早期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齐门弟子杨玉圣教授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辛勤耕耘，他和他的弟子们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客观地说，在我国美国史研究向纵深和横广两个方面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有一种相对弱化的趋势，这突出表现在除北大、南开以外，其他多数美国研究专门机构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北大在美国早期史专门领域的持续深入研究的重要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中美关系是我国与各国关系中最重要、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了解和研究早期中美关系是全面审视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是研究中美早期关系史的重要基地，齐文颖先生和罗荣渠先生在早期中美关系史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努力，如《美国史探研》所显示的，齐文颖先生选择了过去很少有人涉及的中美关系开端的问题和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方面的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其中《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北京大学在早期、近代和现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上的重要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加上北大国际关系研究所、北大历史系从事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力量，那么北大从早期到当代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实力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 第三，北大也是美国妇女研究的基地

正如齐文颖先生在《美国史探研》前言中说，妇女史研究是“我国美国史研究中延伸出来的一个新领域，同时也是我们对国内美国史研究做出的新贡献。美国是当代西方

妇女研究的重要基地，是 70 年代以来发展最快、最有显著成绩的学科之一，也是研究美国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80 年代初，齐文颖先生“作为第一批访美学者不仅带回了殖民地时期史和早期中美关系研究的新课题，也带回了妇女史研究这一新学科。”《美国史探研》中妇女史研究 4 篇论文，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从事美国妇女史研究学者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今天已经看到我国学者对美国妇女研究所取得的新成就，北大还专门成立了中外妇女研究中心，拓宽了妇女问题研究领域，今年是国际妇女节的 100 周年，我们期望齐文颖先生的开拓精神能够召唤更多的美国研究学者为我国的美国妇女研究做出新贡献。

#### 第四，北大有美中文化交流的传统

正如齐先生的得意门生满运龙所说：“齐老师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率先走出封闭的国门、在美国留学的访问学者”，“齐老师在积极推动中外史学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为中美史学界的深度交流与友好合作架起了桥梁：一是邀请著名美国史学家来北大讲学，二是推荐学生赴美深造，三是主持翻译美国学者的著作。”“除了前辈学者张芝联教授外，在促进中外（尤其是中美）史学交流方面，也许只有罗荣渠教授、冯承柏教授能和齐老师相媲美。”对于这一点，我们的许多中青年学者是受惠者。我想补充说的是，齐文颖先生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开展了北京大学对美文化交流的深度研究。在《美国史探研》中有一篇她和郑文鑫先生合写的《北京大学与中美文化》论文，以详尽的资料阐述了自京师大学堂到 80 年代末北大与美国文化交流史，文章特别提到：“北大作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研究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同时，还有一批原始资料尚未被研究者充分利用。为了开拓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新领域，为了使这批资料能获得充分利用，我们选择了这一选题。”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走出去，请进来的美中学者间交流和对话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而这正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良好局面的形成是和张芝联先生、罗荣渠先生、齐文颖先生对外开拓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其中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对富布赖特项目的推动。

#### 第五，北大有建设学术共同家园和重视图书建设的传统

齐文颖先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多年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副会长和顾问，对于建设中国美国研究的学术共同家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续编》中王立新、王海燕对齐文颖教授访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的前前后后》记叙了齐文颖先生对研究会建设的关注和贡献。笔者和齐文颖先生在研究会里长期合作共事，对她顾全大局，积极推动研究会学术家园和谐发展的印象尤其深刻。我们很清楚，北京大学的美国研究在全国首屈一指，但是北大学者从未担任过理事长职务（李剑鸣是加盟北大前就已经担任理事长职务的），北大齐文颖、杨立文等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理事会领导班子和秘书处的工作，这种团队精神和凝聚力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是很可贵的。

重视图书建设是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北大的丰富馆藏图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和老一代学者的收藏和重视是分不开的，齐文颖先生在这方面也做出了许多贡献，如她在《探研》前言中所说：“美国学者在北大讲学的同时，还为我们捐赠了一个以研究早期史为中心、有一定规模的北京大学燕京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图书馆，目前它已成为我国研究美国史的重要图书馆之一”。我们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也分享了北大美国图书建

设的成果。

#### 第六，北大有尊师重教、尊重学术、尊重学者的传统

这三个尊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是落到实处、落到为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学者举行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著作和庆贺八十寿辰上。如果没有年轻学子的尊师重教、尊重学术、尊重学者精神，没有现任系领导的组织和支持，这样的活动是很难组织起来的，这件事在北大能够办到，在有的学校就不一定办得到，对此我深有感触。

在我们这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相比刘绪贻、黄绍湘、杨生茂等 90 多岁老先生，齐先生不算老，相比 105 岁的周有光老人，齐先生还只是小字辈。衷心期望齐文颖先生健康长寿，并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为泽惠后学、为美国史研究开辟学术新天地。衷心祝愿北大学人发扬优良传统，更上一层楼，取得新成就。

#### 杨立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齐文颖大姐的 80 岁生日到了，非常高兴，今天校内外亲友在这里聚会为她祝寿，我敬祝她生日快乐，健康长寿，万寿无疆！

受北大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陈燕萍同志的委托，让我代她向齐文颖教授致贺：祝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并深谢她长期以来对北大加拿大研究中心的支持与贡献！

我本人与北大齐氏一家关系特殊：因为齐思和教授是我的导师。老先生与我父亲同年，都是 1907 年生人，大齐又与我姐姐同年(1930 年)。齐老先生被公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中学时期就读完了廿四史。30 年代初他在哈佛攻学位时，就研究了美国黑人问题，他用英文写的黑人史论文就在美国发表了。所以我在大学时选美国黑人史作为毕业论文题目，系里就指派齐思和先生作我的导师。在同学中我出入燕南园齐府次数最多，也认识了齐家兄弟姐妹。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历史系欧美史教研室工作，大齐又长期是教研室领导，我在大齐、老潘领导下，从事欧美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因此对齐文颖同志的工作与贡献比较了解。我认为齐文颖同志对我系美国史教学与科研有多方面的贡献：

1. 创建了北大历史系美国史小组。1972 年尼克松访华，揭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当时的形势是，因“文革”停滞多年后我系的美国史研究应该上马了。齐老先生让大齐把研究重点由英国史转向美国史。她首先成立了我系美国史小组，任务是帮黄绍湘教授修改《美国通史简编》。每两周开会一次，成员有大齐、黄绍湘、罗荣渠和我。这部书经修改后发表了。

2. 改革开放后，我系美国史小组在大齐领导下接待了多批次美国来访教授和富布赖特学者，如威廉·怀赛、E.B.Smith、Bruce Stave、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等等，发展了与美国的学术交流。

3. 北大美国史小组也参与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工作。1979 年 12 月 1 日武汉成立大会，我们也是创始会员之一。我们去武汉参加了成立大会，并成为研究会的积极成员，合作编写《美国通史》，还协助在北大开过多次该书编写工作会议。

4. 齐文颖教授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美国史研究生：满运龙、杨志国、陈勇、叶霖、郭奇涛、胡新军、杨玉圣、郑文鑫、陆丹尼、秦玉成、张雄、王其寒。这些同志都成了栋梁之材，在国际、国内正在发挥重大作用，今天他们中有些人就在现场。

5. 大齐还推动了全校的美国学研究。在大齐的努力下，美国研究不仅在历史系也在全北大开展起来。北大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在图书馆还设立了富布赖特美国研究书库。因工作需要，1989年12月大齐调到图书馆，负责全校美国中心工作，直到退休。在这一工作中又做出了重大贡献。

可喜的是，今天我系的美国史教学与科研力量都大大增强，增添了一大批专家能手和新生力量，情况远非昔日那几枝枪可比。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但我觉得在这种大好形势里，凝聚着开路的辛劳，我们不能忘记呵！

###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贺齐文颖教授的八十华诞。在座诸位中的大多数可能比我更熟悉齐教授。多年以来，我仅偶尔有幸聆听她的教诲，瞻仰她的风采，感知她的魅力，但是，我深信，我已懂得齐教授身上最重要的特质。

她有着出色的学识，在国内美国历史研究的两个领域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的贡献：殖民地-早期共和国史以及美国妇女史。这两个领域都极其重要，且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探索是相当困难的事。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仅在一个领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就足以令人十分钦佩，而齐教授在两个领域都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在学术研究之外，她诲人不倦，几十年如一日地教育、培养学生，其中许多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中的一流人物。做好学术研究，需要在智识上出类拔萃，而要育人有成，则需要一种更为珍贵的、源于天性的情感与品质。

齐教授有着卓越的品格，集严谨、勤奋、同情心及超脱于一身。念及她的书香名门出身，我们可以说，她有一种“贵族精神”，且是得其精华。

在上周的一次学术访问中，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士问我：我的伟大老师——王绳祖教授对我以及我的学术生涯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这样回答他，最重要的是，他使我深信历史和历史研究真的很重要，甚至比它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兄弟”或“姊妹”学科，哲学和文学还重要，更不用说它的“远亲”社会科学了。

作为从历史领域“入侵到”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按照目前盛行的狭隘且不完全正确的标准，它算是“政治学”的分支）学者，我得说：我是读历史和研究历史出身，这首先就决定了我对历史考察和思考有一种很深的情感，很重视。有人瞧不起历史，虽然口头上讲历史，实际上不看历史。我却相反，总是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强调“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连同哲理理解和广义的文学透视）”的头等甚而头号意义，而且有愈益增进的反响和影响。

历史总是叫人要谦虚一些，历史证明人的认识能力、预见能力和成功地自觉塑造历史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远不像有些社会科学学者认为的那样。不仅如此，凡是比较懂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机械、宿命和刻板地看待世界，他们总是会承认偶然性的巨大作用，总是承认某种变更或不可预料的“突变”（“surprise”）的可能性，总是承认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成功的同时也有失败、犯错误、背运和悲剧的重大可能性。另外，搞历史的人一般来说非常尊重经验和实际上基于丰富经验的所谓直觉，而对那些“科学”的东西不是那么崇拜。设想一下，连“历史”给你的东西都是有限的，“科学”能给你的东西就会更加有限。

当然，搞历史的人有时候也会夸夸其谈，也会用所谓的博学来吓人，或者成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们相对而言知道的过去的东西较多，看过的历史图景较多，比较知道“天高地厚”，比较明白世事无常或少常，连同“天人之际”的巨大复杂性和多变性。一般来说，人文学家谦虚一些。谦虚非常重要，谦虚就是认识到人类的局限，认识到任何一个人的局限。

谈及历史学，我想借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和古典学权威教授——唐纳德·卡根的一番话来表明我的观点。几年前，卡根在对美国全国人文学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主席布鲁斯·科尔作了一次谈话，供该会发表。他在其中说：“历史饶有趣味，历史可供享用。在整个人类经验历程中，人们一直阅读历史，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愉悦，同时这以某种方式具有教益。[我们当代的]历史学教授行业却已将它带入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在作为一个行业写历史的人们与读历史的人们之间，先前从未有过像现在有的那么一种鸿沟。对大多数人来说，[由这些专门家写的]历史不显得有趣，不显得与他们感兴趣的東西有多大关系。”

在回答科尔所提“为何如此”的问题时，卡根答道：“[因为]这个行业搞了一种特定的转向，转离了……讲故事——一种叙事行为。历史有它自己的解释事情的方式。史家解释事情的方式是讲一番故事。他们问一个问题，其答案是一番故事……它是对史上实际发生的种种特殊环境的一系列人类反映，从而产生……一番故事。”“我认为，自然科学的力量迷住了人们的心灵，结果任何并非一门科学的事情不知怎地就不被当真。因而，人们断定，我们历史学家做的事必须是一门科学。这种张冠李戴发生得越多，它就越背离传统的历史学问概念。”“在我看来，最好的历史是讲一番故事，同时将它与分析结合起来。对一位史家来说，分析事情的自然而然的途径包括用一番故事作答。讲一番有趣的故事，同时将它与回答种种问题结合起来，而回答的方式是一个具有才智的人有兴趣聆听的：这就是最好的历史学问。”

### 王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首先祝齐老师生日愉快！

我其实跟齐老师并不是特别熟悉，真正熟悉是从去年的十月份，10月22号我到齐老师家里采访她的时候才真正的了解了很多。那么，最早听说齐老师是在读一个美国学者到中国来做富布赖特 scholar，大概是杨立文先生刚才提到的怀塞。他在八五年的时候写过一篇长文，讲他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里面就提到了齐先生，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读到你的名字，它里面有很多细节的描述，当时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开放，非常困难，他提到。我看到他用词是非常委婉，所以，我可以想象当时那种情形，就是齐老师为搭建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而且当时的国内条件也非常的艰苦，能够需要沟通学校还要沟通外校，这样做了很大工作，随后就是遇到了运龙、陈勇等一大批齐门弟子，所以齐老师的名字在我认识她之前已如雷贯耳。直到去年，就是十月份，因为我做一篇中国美国史教育60年的研究，所以我去采访了齐先生，还同时采访了黄安年先生和杨立文先生。那么在跟齐文颖老师谈话的过程中，我才感觉到就是说齐老师在美国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力量。而且我还有另外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齐老师的历史就是她的治学求学的历史，不是她一个人的历史，我感觉到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因为齐老师告诉我齐思

和先生是中国最早开设美国史教学的，1936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而且，齐老师告诉我齐思和先生在哈佛留学的时候选了所有美国史的课，而且做过 Arthur Schlesinger Senior 的学生，后来这个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所以我就读了很多齐思和先生的材料，而且北大图书馆也看到齐思和 1937 年写的《美国史纲要》，书目举要，这本书我觉得当时非常难得，1937 年的时候写的这么个小册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叫做注释性书目，当时把这个可以说美国在三十年代最先进的、最优秀的学术著作介绍到中国来，而且按照美国的学术研究方法写了非常精细、文字非常儒雅的介绍，我觉得非常难得。

然后，也都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就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去年 2 月的时候，我正好去德国自由大学，在那儿碰到齐老师的侄子也是我的同事，就是北京大学的李维教授。然后我等于就是一下在短短几个月里边也同时从齐思和先生、齐文颖教授、李维这一家三代，这使我想起中国的美国史发展，当时李维是搞德国史的，但也是世界史。顺便提一句，李维听过我的课，当研究生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发展尤其是在现代，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如果我们将来要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家族，他把这个领域传承下来，这个在中国学术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在美国的学术史上也不多见，唯一能想到的就是 Schlesinger, Arthur Schlesinger Senior 和 Arthur Schlesinger Junior 两个人都是哈佛的教授，而他们也只有两代人，而齐老师一家是三代人，说不定将来李维还可以继续把这个传下去。

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还有齐老师的学生讲了很多，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这就是牺牲精神，齐老师的牺牲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铺路、搭桥、为他人的成长做出贡献，我觉得这可能是做老师最伟大的地方。刚才时殷弘老师讲得非常好，淡泊名利等等。那我觉得这个牺牲精神是我们现代学者最缺乏的，我们现代学者想到的是我如何处理我如何挣得利益，我如何多上电视，我如何多发著作。而齐老师她所做的默默无闻，铺垫，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管是郭琦涛也好，运龙也好，等等。如果没有当时齐老师的铺路，可能不会有他们的今天。而当时这个铺路所做出的贡献，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齐老师还有包括齐思和先生，可能给我们树立的是道德的丰碑，这个是很难超越的，但可以去努力。

最后我把齐思和先生的在哈佛大学时的博士论文送给这个齐文颖老师。因为在采访齐老师的时候呢，她给我提到她说文革中间家被抄了很多次，她说我们家一直没有一份齐思和先生在哈佛的论文。后来我就请我妻子，她是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到哈佛大学去把齐思和先生的论文找出来。但是论文不能拿原件，只能用这个 microfilm，微缩胶卷，所以把微缩胶卷拿回来以后，买了一个微缩胶卷，然后她一页一页的把这个通过阅读器把它印成 PDF，然后，我们把它装订了，做了两本，一本送给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保藏，然后这一本送给你，然后微缩胶卷我已经把它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了。谢谢大家！

####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恭祝齐老师生日快乐！我跟齐老师的接触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少，第一次与齐老师见面是 1991 年在社科院美国所开美国学研讨会。我 1998

年调到北大后，齐老师已经退休了，但跟齐老师一起参加过美国史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答辩会上经常聆听齐老师的高见。后来因为学会的工作需要跟齐老师有一些联系，齐老师的女儿和我住一个小区，经常在小区里经常看到齐老师散步或买菜，有时候打打招呼，聊聊天，跟齐老师有一些接触。

我今天想谈两个意思：一个是齐老师的学问境界，另一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想。我对齐老师的学问境界非常钦佩，记得胡适谈到做学问时曾说，学者做学问有两种风格和境界：一个是开山斧，一个叫绣花针。开山斧实际上是指要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做宏观的研究，要能够改变前人的成说，提出大的、新的见解，甚至确立典范，那么这是开山斧的工作；另一种境界就是绣花针，他谈到绣花针，是指从小处手，做小题目，收集丰富的材料，把小题目做的非常精致而深入。但一般说来学者很难达到这两种境界，因为能够抡得起开山斧的很难拿捏绣花针，能拿捏绣花针的很难有力气抡起开山斧。我想对比齐老师的境界，齐老师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达到既能够拿起开山斧、又能够拿捏绣花针的境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齐老师的多篇论文体现了这一点。包括马克垚老师，还有其他几位先生都已经谈到了，齐老师在美国早期史、早期中美关系史、妇女史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实际上是开辟了新领域，开风气之先。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刚刚起步，齐老师的工作确有开风气之先的功劳。同时，齐老师的很多文章，比如说她关于“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问题的研究，对独立宣言是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标志的问题辨析，大体都可以说是绣花针的工作，给我们绣出了非常美丽的图案。所以齐老师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到这两种境界，既有开山斧的开拓性的工作，又有绣花针细小、考证性的工作，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也很有幸看到齐老师的一些弟子，包括在国内的玉圣兄，在国外的陈勇教授，已经继承了齐老师的工作，延续了齐老师的境界。我本人，甚至我们这一代人，也包括我现在培养的研究生，作为晚生和后辈，很难达到这种境界。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做的就是一点绣花针的工作，可能绣的还不是很好，一直到现在，只能做一些小题目。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资料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外交史领域，资料非常丰富。现在一般学者都能找一个小题目，收集丰富的资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或政策过程呈现出来，也就是做一些精雕细刻的工作，但很难有一些开拓性的贡献。我想，齐老师能够达到学术界的两种境界，跟齐老师的个人的学养、天分和勤奋有很大关系，当然也跟那个时代，中国美国史研究刚刚起步，有大量领域需要去开拓和创新也有关系。就现在的学术界而言，虽然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已经很好的积累，成果已经蔚为大观，但仍然有需要开山斧的工作，包括新领域的开拓，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运用，新视野的开辟，都需要开山斧工作，但是年轻一代很难达到这一点，我个人对此也比较焦虑。前辈学者，包括齐文颖老师和其他老一代学者，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敬仰，特别是他们这种开拓性的开山斧的工作。我个人，我也会教导我的学生，要尽量朝着这样的境界去努力，本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多多向以齐老师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学习。

# 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漫谈

齐文颖

各位在百忙之中来参加这个会，说实在的确实是做出了很多牺牲，大家很忙，或者是稍微有一点闲的话要处理家务事，我们现在的负担都很重，大家把这个事儿也都给撂下来，来参加这个会，我自己实在是感激不尽。第二，我自己应该感谢的是在座的同志的这些鼓励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很不名副其实，我只能把大家的话当作对我的鼓励，当作对我的鞭策，当作我今后努力的方向，实在是不敢当。

还有一点，我觉得今天参加这个会，可以看到我们美国史的成长历程。说实在的，我自己从事美国史的研究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所以我们特别应该感谢改革开放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命运或者是机遇。本来我是搞世界近代史的。世界近代史是我大学时期、研究生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前时期里头主要学习和教学的任务。世界近代史所以后来就有些改变，主要是由于我们系里头有当时在 70 年代，那时候还没有打倒“四人帮”，有一个任务下来，就是说世界史专业，除了教世界史之外，还要有一个参加三个霸权的研究，一个叫美苏争霸，这是第一霸权；还有日本、亚洲的霸权，我自己想我一直是从从事近代史的教学，多少做过一些英国史的研究，那么现在面临这三个霸权，要选择哪一个，那么当时我们还要带头，作为教研室的一个负责人，你要不带头选也不行，所以我们就觉得比较靠近的就是美国史，就研究这个霸权吧。说实在的，组分了是分开了，可是实际上没有进行霸权研究。因为霸权是一个当代的问题，我们学的是，相对来讲，是早一点的，是世界近代史。所以我们对霸权的研究，就刚才跟杨立文教授所谈的那样，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美国史研究小组，以黄绍湘老师为首，还有罗荣渠老师，有杨立文老师，还有我。所以我们就开始研究霸权，那么黄老师对霸权也没多大兴趣，黄先生说就讨论我那本《美国早期史》吧，大家看看根据新的看法有什么意见、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提提意见。所以我们那个小组活动就变成两个礼拜一次，在黄老师家里头，黄老师非常客气，给我们准备蛋糕、茶，就在她那里就讨论起来了。《美国早期史》当然因为当时的条件也有个别地方也有不太妥当的，我们反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后，就到了改革开放，要扩大眼界，要走出国门，放眼看世界。这样美国史组的人就开始转入正轨的学术研究，所以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我们这小组来说是一个新生，我们就开始正式研究美国史。

我今天还想谈一点感想，就是关于美国史组或者我们从事美国史的人，今天在座的多半都是从事美国史的，还有一部分人还是对美国人、美国史有兴趣的或者是关心美国史的。所以我们济济一堂或多或少的都是研究美国史的。我也简单回顾一下美国史研究发展的历程。在中国，美国史开始是在 1930 年代，1936 年是我父亲齐思和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他本来是搞中国史的，他去美国，他的导师和燕京大学历史系建议他上美国。他不愿意去美国，跟现在不一样，他觉得上美国去是耽误时间，他说我不研究美国史，跑美国去学习，花四年时间，有这四年时间还不如上西山念书去，能够在学问上能够有很多大的改进，现在从头学起。后来结果他老师说你要到美国去，就去哈佛大学，哈佛

当时是美国研究美国史的重镇，那里名师云集。他听了老师的话，那个时候就是恭敬不如从命，所以这样他就到了美国了。到了美国以后，就一直扎到美国史里头，从头学起，他就除了学习美国史的知识以外，同时他还学习美国史的研究方法，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美国历史，他们是用什么理论来研究美国历史，所以他当时跟他导师 Schlesinger 教授关系最好，因为他当时就已经提出一个新观点——New history，就是研究群众的历史、研究社会的历史、研究文化的历史，而不是研究政治史、外交史等等。那么，他到美国去以后，当时到美国学习美国史的人，据我父亲所了解，当时就有两个人，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就是清华预备学堂的，他是到耶鲁去念美国史，比我父亲还早，可是他回国以后，就回到他湖南他老家了，当时湖南还没有条件能开美国史，所以他学的是美国史，他回来以后教的是世界通史。这样，我父亲就是他因为在北京沾了光了，所以他学的美国史，回来以后就开美国史，他第一个开美国史的就是在北师大，1936年开了美国史。作为一个专职的教授来讲，一个人必须开两门课，他同时开了一个史学概论。美国史就这么开始了，他就是等于全中国的大学里面，他是两个到美国学美国史的，最后回来教书的是一个，到中国来教美国史。美国史在当时不是很受重视。所以学校里头当时开美国史，要不是胡适先生鼎力支持的话，那么这个课不知道能否开出来。胡适因为是在美国留学回来的，也很欣赏美国史，他觉得美国史不但是教美国史的学问，而且要教美国的史学方法和史学理论，就这样，他在北师大不但是一个专任的老师，同时在北大、清华都兼任美国史老师，他都开设了美国史课，这样影响就比较大了。可是到七七事变以后，就中断了。因为当时我们全是因人设课，我们除了通史以外都是因人设课，所以这样他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到内地去，他就回到了他的母校燕京大学，就开上了是世界现代史的课。

到了五十年代，我们首先开美国史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诠释美国史，就是黄绍湘先生。黄先生也是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 new school，她一直都是从事进步学生运动，她原来是在中国的时候，是念英文的，教中学的英文。当时中学很棒，不是我们现在想的中学。然后她到美国专门研究美国史，她接触的都是美国进步的史学教授，像方纳。她回来以后就在山东大学开设了美国史，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讲美国史，当然这个美国史她究竟开了多长时间，开得怎么样，因为资料还查不着不了解，但从她写的《美国简明史》来看，就看得出来她当时的观点、参考书和她那个讲课的范围。这也是一个星星之火，但因为是在山东，所以她的影响不是很大。它不像现在全国，尤其这互联网时代都是彼此沟通得很快。她在山东，就一个人在那儿搞，搞了一段时间，据杨立文教授考证，1959年到了北京大学，到了我们历史系，可是黄老师的身体一直不好，所以她虽然待的时间不短，但从来没上过美国史的课。后来，她就觉得北大也不太适合，就提出来去社科院，社科院因为它是研究机构，可以不讲课也可以讲课，后来她又讲了课，也带了研究生，那是后来的事。

中国美国史研究的传承真正到了一个有发展、有前途、受重视的时代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史就到了一个新的时期。人人都研究美国，人人都关心美国，人人都看美国。当然，学习美国史是少数人，但这个大环境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一边倒”的时候，把美国当成敌人、头号敌人、帝国主义的头脑，这个全过去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的美国史的老师，说实在的，全是像我这样的，都是转行的，因为你原

来即便学美国史的或者中外关系史的，那么也都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都教了世界通史了，或者教近代史，或者教现代史，或者教古代史。那么，第一代的美国史，我们也忝列其中吧。当然，学问有深浅，像杨生茂老师，那他是潜心搞美国内战、黑人史等等。他搞美国黑人运动史，做出了很大成绩，但也脱不了要搞世界通史这条道儿。那么再从这一代往下，黄安年老师，好像也是教世界现代史。我们原来念那个阶级斗争历史的时候，就拿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来说，就讲美国就三点，第一点是美国革命，第二点是美国内战，第三个就是美西战争。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一代一代的新人在成长，一直发展到今天，我觉得这美国史成了一个空前的热门学科之一，大家都喜欢研究美国，不管从哪个角度研究美国，从反面的、从正面的、从侧面的等等，全是研究美国。发展到今天，我就觉得美国史出现了几个空前：

第一，美国史的地位空前提高。过去美国史不是世界史里头的一个重点，世界史的重点是欧洲史。重视欧洲，重视欧洲的关系，它们是主角，美国史不是主角，现在美国史成了主角。历史系开美国历史，国际关系开美国对外关系，政治系开美国政治，经济系开美国经济，甭管什么系，包括理学院都是跟美国沾边儿的都有或者研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跟美国有关系的，天时地利，就研究美国成为一个空前的地位的提高，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第二，美国史的研究队伍空前壮大。过去哪儿能想象这么多人从事美国历史的研究，把美国历史还分成早期、晚期、现代、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等。过去研究美国历史就是一揽子，美国历史。我们如果有机会看一看早期的关于美国历史的著作，在民国二三十年代，有了美国历史的时候，就是比尔德的那个小学课本讲美国历史，当时的水平就是这么一个水平。那今天的美国历史，这个队伍空前壮大，我们在座的都是科班出身，我们都是不但有学士学位，还有硕士学位，还有博士学位，还有什么多教授，这在过去根本不能想象。

第三，我们的美国史藏书空前的多。念历史，不像别的，没见史料你就不能说话。没有史料，不就等于瞎说吗？现在我们的藏书不管是第一手的、第二手的，美国历史都是受重视的，因为它还有很多旁支的科学，所以对美国历史的藏书，不但有大图书馆藏书美国史、美国问题的比重占得多，而且各个学校像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北大都有单独的关于美国的图书馆，就是专门研究美国的图书馆，这个加起来它的实力就很雄厚。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美国史的研究机构，从美国史刚一成立就由我们的前辈就是刘绪贻先生、杨生茂先生、丁则民先生、刘祚昌先生等等，倡导要组织一个机构，不但要自己搁在自己的系里头研究美国历史，要统一全局，要把它变成一个网络化，变成一个平台，那么彼此交流、彼此吸收和彼此提意见等等，这样就促进了美国史的交流。美国史研究会在他们几位前辈的倡导之下，是中国专业史学会里成立最早的之一。有了这个平台，也等于是我们队伍的一个培训的基地。我每次都参加美国史研究会年会，从中得到很多教育，同时也壮大了我们的队伍。

最后一点呢，就是对外交流。我们这个对外交流的工作也做得不少，我们研究美国史，要走出国门研究美国史，这是我们解放后的新局面，到美国去研究美国史，是吧？而不是在中国，不是单靠中国来研究美国史，美国人怎么研究美国史，中国人怎么研究美国史，或者法国人怎么研究美国史等等，所以说有了这个平台、有了这个交流，

有了这个，所以这个培养出来的人就不同一般了。那么，我们今天交流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今天交流的程度就是说我们可以请到外校的，像李剑鸣老师，像这个王希老师等等，都是外校的到北大来，原来全是近亲繁殖，各个院校都近亲繁殖，时殷弘老师从南京大学到了人民大学，这是一个开放的心态，就是各取所需，取长补短，所以使得世界史成为一个兴旺发达的一个学科。

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特别感谢杨玉圣和满运龙对于会议的组织。我觉得今天能够跟大家在一起，首先我是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其次，我是感谢大家的光临，虽然我不赞成搞成这么大规模，因为大家都很忙，只是这个学生们热情帮助，我就说这些。谢谢！

（以上两则文稿来源：兰教材、孙洁琼、杨玉圣：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聚会暨《美国史探研（续编）》首发式研讨会”综述，《云梦学刊》2010年第3期。）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贺信

尊敬的齐文颖教授：

齐教授多年从事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深得广大会员的尊敬和爱戴。

适逢教授八十华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向您表示由衷的祝贺！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10年3月12日

## 武汉大学李世洞教授贺信

在文颖教授 80 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请接受我衷心的祝福和祝贺！

我们相识在 1979 年 5 月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上，自那时以后，我们就有了业务和会务的联系。特别是在我担任秘书处工作期间，这种联系就更为频繁。我从您那里不仅得到对会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还从业务上得到很多启发。

您知道，我在美国史专业方面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业务底子远远比不上您。所以对您的文章特别是关于早期美国史的文章，我是很重视的。记得您《〈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识吗？》，就对我启发很大。这篇文章针对我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美国立国时间的误解提出很有见地的意见。从这里我看到您“知微见著”的治学精神和细致考证严密论证的治学方法，真是获益匪浅。这篇文章题目虽然不大，篇幅也不算太长，但在我看来远比那些空洞无物大话连篇的“长篇巨著”要强过百倍。

您不但治学严谨，而且育人有方。从您培养的学生在今日学界中的地位和工作成绩就可以得到证明。一个学者一个教授做到这两点可以说不虚度此生了。

现在您的高足正在满怀着感恩和对学术敬畏的心情为您的 80 华诞做着认真的准备，我相信这个盛会一定能办得高雅、隆重。我远在武汉无法在佳时前往祝贺，只能用这简单的书札表达自己的些许心意。言虽简而情至深。

## 评《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

张聚国

中央电视台斥巨资拍摄的《大国崛起》在 2006 年播出之后，在中华大地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大国崛起成为普通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在这个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的时代，崛起中的中国期盼借鉴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尽快跻身强国之列。中国法制出版社近期推出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安年的新著《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正好满足了公众渴望了解大国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的愿望。

《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全书分为“崛起篇”、“发展篇”、“危机篇”、“美中关系篇”四个部分。“崛起篇”收录了 10 篇文章，是对几十年来作者有关这个问题的思考的理论性总结。早在 1992 年，黄教授就出版了《美国的崛起》，探讨了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到 19 世纪末美国崛起的历史过程。1993 年，黄先生出版了《美国社会经济史论》，涉及美国崛起的特定历史条件、发展道路与特点等问题。而在本书的“崛起篇”，作者把美国近代工业化的开始和基本完成作为美国崛起历程中的主要标志，认为美国崛起的历程从 1815-1894 年经历了 80 年的时间。美国崛起过程完成的时间是在 19 世纪末，到那时，美国在工业总产值上超过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作者强调要把一个国家崛起的历程与崛起后的发展过程区别开来；20 世纪是美国崛起后的世纪，是美国在崛起后走向超级大国和极力维持超级大国地位的时代。在这一部分，作者总结了美国崛起的 5 大特点（年轻快速、实力最强、富有活力；外来移民持续不断；民主共和制；商品经济和垄断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对外开放和社会机制不断调整），分析了美国崛起的独特条件：没有经历封建制度发展阶段，封建影响相对来说最小；大陆扩张和西进运动；长期处于和平与发展的国内环境。美国崛起的其他重要动因，如民主政治体制、教育、法治等。作者认为，美国崛起的历程留给世界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有些经验却并不符合别国的情况，不适于借鉴。因此，我们“不能照搬美国崛起的经验，不能离开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来泛泛而谈借鉴。”（第 71 页）

“发展篇”收入了作者的 12 篇文章，从现代化角度，阐述了美国发展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特定历史条件（外来移民、封建影响较小、大陆扩张与西进运动、稳定与和平的国内政局以及历次战争）和主要动力（科学技术革命、社会保障机制、19-20 世纪初期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改革、美国历代政府政策）。作者认为，美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可以分为近代化（1814-19 世纪末）、现代化（1898-20 世纪 90 年代）和后现代化的信息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三个时期。作者指出：“美国的崛起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活力，这种活力是和她在发展中逐步完善和进一步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机制是分不开的。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在崛起后继续快速发展，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名列世界榜首。”（第 27 页）

“危机篇”收集了作者 2008 年 1 月至 2009 年 6 月间撰写的 50 篇时评性文章。这些文章的核心主题是，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政府对策，及其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全球经济（包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些时评性的文章时时返观 1929-1933 年的美国经济大危机，对二者的影响与政府对策进行比较，这要比政治学者的文章更具有历史感和纵深感，分析更为深刻。黄先生认为，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政府未能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他总结说：“市场经济机制运行和政府干预政策间的有效协调成为制约 20 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十分重要因素。如果处理妥当，则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健康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则将带来现代化的受阻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困扰，两者关系的处理，反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变进程，意味着现代西方世界由早期走向成熟。”（第 285-286 页）

“美中关系篇”收录了作者的 24 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在网络上发表的时评，回顾了美国立国以来迄至当代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历史阶段，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以及发展未来中美关系基本原则。作者认为：“中美关系只要从两国的根本利益出发，信守三个公报的原则精神，中美双方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两国关系就会得到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出现曲折。”（第 418-419 页）作者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势进行了预测，认为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中国的发展需要美国，美国的发展同样需要中国。尽管美中之间存在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上的重大差异，但是同时美中之间还有着愈来愈多的共同利益，美中之间需要加强对话，密切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共克时艰，寻求共赢的发展模式。”（第 516 页）

黄先生的论著在研究方法和治学态度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后学学习和发扬的地方。

第一，在研究中处理好历史研究的博通与专精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北大历史系教授李剑鸣写道：“博、通、专、精，是对史家的四种不同的要求。‘博’是指知识渊博，不仅知识面广，而且了解很深；‘通’是指对各种知识能够消化吸收，融会贯通，为己所用；‘专’是要求学者有具体的领域，对某些问题下专深的功夫；‘精’侧重的是学术质量，要求学者写出高水平的著作，做出独到的成就。博、通、专、精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不可偏废一端。求专精，必先博通；而博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专精的成就。博而能通，即专且精，方为良史。”黄先生在科研中比较好地处理了博通与专精的关系。好多中青年学者还难以企及。他出版的《美国的崛起》、《20 世纪美国史》和最近出版的这本书体现了他对美国史博通的一面，而他对美国社会政策保障政策的研究（代表作是本书收录的论文《富兰克林·罗斯福和 1935 年社会保障法》等文章和专著《当代美国社会保障政策》），则是他专攻一个研究领域的成果。

第二，强烈的现实关怀是黄先生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早 20 世纪 80-90 年代，黄先生就指导他的研究生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美国环保政策、反托拉斯政策、教育政策等问题进行研究。他本人对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长期关注和研究，他在自己主办的学术交流网和科学网个人博客上的时评性文章，以及本书“危机篇”和“美中关系篇”中的

---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174 页。

文章，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和作者力求从美国的发展历程中探求中国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应当汲取的教训。他对历史的研究，时时体现出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观照。如作者在对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的利弊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应当注意的事项提出了十方面的建议。（第 188 页）他对美国经济危机的关注，更多的着眼于它对中国的影响和对中国做好应对未来类似危机的准备的关切。

第三，不迷信权威，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如黄先生对美国衰落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根本标准来衡量，当代美国的社会生产力仍在继续发展，仍居明显的优势地位。”从 21 世纪以来的发展态势看，美国“仍是一个富有活力的超强大国”。（第 253-254、260 页）。黄先生对媒体所谓当前美国的经济危机属于“百年一遇”的危机提出质疑，提出如果说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还比较合适。黄先生还对“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提出质疑，指出 21 世纪既不是美国的世纪，也不是中国的世纪，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发展的世纪”。（第 488 页）作者也不同意个别媒体炒作的中国“领导世界”论。

第四，实事求是、秉笔直书。黄先生认为，黄先生提醒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和自我定位时，不要头脑发热，应当放眼世界，关注“球情”，避免盲目乐观、夜郎自大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判断一个国家的兴衰时，“把握时代发展的坐标是十分重要的，就一个国家看，既要看纵向，又要看横向，更要坚持同一个标准，我们不能将预测建立在其它大国停滞发展的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不能以为在全球化框架下一国的衰落或者相对衰落就一定是另一个国家的胜利。科学发展观要求具有科学的‘国情’观和‘球情’观。如果我们对于‘国情’沉醉于盛世赞歌，而对于‘球情’缺乏客观判断，尤其是对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认定‘衰落’论的判断，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学术工作者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干实事”（第 263 页）；“我们在致力于建设四化大业时，应当谦虚谨慎、脚踏实地而不是趾高气扬、咄咄逼人，动辄赶超和‘说不’，甚至当某项指标上列居全球第一时喜形于色，不可一世。”（第 456 页）他认为应在国民中培养忧患意识。他写道：“历史的经验应当注意。居安思危，在繁荣发展时期时刻注意潜在危机，防患于未然，具有危机感、时代感、紧迫感总比整天沉醉于大好形势，躺在大好形势上丧失警惕要强。”（第 437 页）“美国民众的忧患意识是件好事情，比起大难临头还在高唱赞歌要强。时刻抱有忧患意识是成熟的表现，在危机时期尤其重要，对于我们的舆论媒体来说引导民众具有科学的危机观刻不容缓。”（第 306 页）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应当保持开放和宽容的心态，“各种文化相互尊重、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求同存异，共创辉煌，是我们应取的态度。”（第 460 页）

当然，《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这本书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第一，论著结构方面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论著框架方面的问题造成一些内容重复。作者一方面认为，美国的崛起应以近代工业化的发生、发展和完成为主线，在 1815-1894 年间实现了崛起。另一方面，作者把美国的现代化进程分为近代化（1814-19 世纪末）、现代化（1898-20 世纪 90 年代）和后现代化的信息化（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三个时期。可见，作者认为美国崛起的时代，正是作者界定的美国现代化的第一个时期，即近代化时期。鉴于这种考虑，作者的本书的“崛起篇”和“发展篇”分别阐述了美国

崛起和美国现代化的特定历史条件，如外来移民、封建影响较小、大陆扩张与西进运动、稳定与和平的国内政局等。这造成了相关内容的部分重复。如果能够重新调整一下框架，合并一些重复的内容，论著会显得更精炼一些。其次，在“美中关系篇”部分，有几篇文章严格地说不属于美中关系的范畴。如《我国跨世纪面临的有利机遇和严峻挑战》、《我看〈象走田，马走日：2030中国的博弈图〉》、《论经济发展观的误区——再论我国跨世纪的机遇和严峻挑战》，等等。

第二，由于责任编辑疏忽大意，造成不少的文字错误未能校对出来。希望在本书再版时予以更正。

读了黄先生的这本新著，我有两点感想。第一，要对美国崛起的多方面因素进一步进行全方位的综合探讨。黄先生本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的崛起不是源于一个或者两个因素而是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某种需要突出强调崛起的某一个因素，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崛起的实际。”（第27页）中国政法大学美国政治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玉圣教授在总结黄先生在该校的演讲时指出：“美国的崛起和发展，有美国的道路模式，这是美国的历史、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美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效应的产物，也与制度创新、人民的创业密不可分。”（第88页）黄先生的研究专长是美国经济史，所以他更多关注的是美国崛起的经济发展方面的特定历史条件和动因。对于美国崛起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动因的探讨，还需要更多学者长期的共同努力和更加细致而具体的工作。

第二，在研究美国崛起的历史进程时，不能忽视其历史中不光彩的一面。北大历史系王希教授指出：“‘大国崛起’的过程本身就包含了野蛮、残酷、掠夺、强权和不文明。”在研究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的同时，也要关注崛起故事的另一面：对印第安人的驱赶、杀戮以及对其文明的践踏和毁灭；对非洲黑人的劫持和奴役。这些少数有色种族付出的巨大代价，也是某些大国（如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美国）崛起的重要条件。“我们在讲述大国崛起的故事时，似乎不应该忘记：早期的‘大国崛起’的故事无不沾满了非洲奴隶的鲜血，无不是在剥夺他人的自由的基础上实现的。这种意义上的‘大国崛起’决非是一项一往无前的、道德崇高的事业，而是一个带有暴力、压迫和掠夺的过程。”在美国，对本土美国人土地的掠夺和对他们本身的杀戮和驱赶，为西进运动铺平了道路。而对黑人长达数百年的奴役，也奠定了南部经济的长期繁荣，并为北部工业化提供了棉花等工业化所需要的原料。

总起来说，《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这本书值得一读。我本人在阅读过程中，时常被黄先生厚实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积累、敏锐的思想、广阔的视野和振聋发聩的观点所折服，所震动。我相信，这本书也一定能够给更多的读者带来启迪。

（黄安年著：《老话题与新挑战——美国的崛起与崛起后的美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12月第1版。全书共523页，42.1万字。）

---

王希：《不可简化的崛起故事》，《读书》，2007年第3期，第24页。

## 学术动态

### 我会多名会员获得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

秘书处

近日 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西部项目评审结果公布,我会多名会员获得资助。我会理事长、厦门大学王旭教授的“20 世纪美国县域经济与城乡经济一体化研究”、副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梁茂信教授的“美国人才吸引战略的历史考察研究”、南开大学付成双的“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获得一般项目的资助。武汉大学谢国荣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民权组织的监控研究”、福建师范大学李昀的“美国与战后初期西欧重建的文化研究”、西南大学王勇的“美国国内地方性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及我国应对策略研究”获得青年项目的资助。延安大学赵红的“延安时期中共与美国关系研究”获得西部项目的资助。

### 华庆昭先生谈资料收集

孙 洁

2010 年 4 月 6 日,世界历史所图书馆/世界历史数字化研究部与《印度、巴基斯坦与中国关系的历史与现状专题信息系统》课题组共同举办题为“从收藏点到数据库:历史资料研究手段的变迁”学术报告会。主讲人为天津社科院研究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华庆昭先生。图书馆/数字化研究部和课题组全体成员及所内部分同志参加了会议。

华庆昭先生主要结合本人的学术生涯讲述了在美、英等国资料收集手段的变化,也谈及了一些相关的思想观念。

首先,华先生回顾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在他研究的领域(美国外交史、现代国际关系史)里国内一手资料匮乏的状况。当时他在世界历史研究所工作,受派去欧洲参加第 16 届世界历史大会及其预备会,需要写关于中国抗日游击战争的论文,但是只能靠从书里和报刊上获取资料来写,学术深度之不足是显见的。华先生引了长恨歌句说,“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要找国际关系史的原始资料得去国外找。“楼阁玲珑五云起”,“中有一人字太真”,资料找到了。从 1986 年到 1988 年,华先生在美国一年半,英国 6 个星期,收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撰写了一本关于杜鲁门外交的专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

华先生说,当时国外的研究手段按现在看也是落后了,但那时还算是很好的一条出路。到美国做研究入门的指引首先是一本目录,叫《联邦手稿收藏目录》(National Union Catalog of Manuscript Collections),这本目录现在还在出,同时也是网站了。目录告诉我们,张三、李四的手稿,在哪里收藏保管着。那么收藏点(Repositories)

何在呢？

国家档案系统，下属国家档案馆和各总统图书馆；  
国会图书馆文献部，在该馆麦迪逊大楼；  
各个地方图书馆；  
各个大学图书馆；  
各个学会、协会、博物馆、纪念馆、基金会的收藏点；  
各县的历史收藏（County Historical Collection），出生和死亡登记都保存在那里；  
各个私人收藏点，等等。

英国的情况大同小异，不过国会图书馆换成了大英图书馆，出生和死亡登记可以在教区里查到。

华先生当年自己所拥有的工具经历了打字机、电动打字机、电子打字机、电脑（没有互联网）、袖珍复印机的变化，总起来说除了书写用了电脑外，其他手段都相当原始，因此研究进度缓慢。后来国内进口了一些缩微文献胶卷和胶片以供检索，情况较前要好些，但不能满足根本需要。由于复印资料很贵，大量的档案内容是用笔写在记事本上。华先生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了六个星期的资料，只复印了六百页文件。近年世界史所的两同事去英国，分别用数码相机三个月内在剑桥拍回了七万张资料照片和一个月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拍回了两万张文件照片。这样的前后对比是非常强烈的。

自从互联网出来后，情况变了。一般的数据库和通用的搜索引擎已经可以解决不少问题，比如永乐三年是公元哪一年，网上一查就有了。专门的数据库，就像世界史所现正在做的印巴中关系专题数据库，正在涌现。最新的消息是，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2010 年 3 月 23 日报道，英国正在做包含 1500 年至 1900 年历史资料的专用英国历史搜索引擎，它将把有关数据库联结起来，把数字化的书籍、报刊、手稿、出生死亡及家系记载、地图和影像都做成索引。第一阶段在 2011 年就可以完成。我们正处在从收藏点到收藏点加数据库、再到收藏点加数据库加搜索引擎的过程中。历史研究手段的进步会带来历史研究本身的进步。研究者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思考问题、把握主题和研究资料的发掘上，而少搞四处奔波、死记硬背和手抄笔写上，真是惠莫大焉。

这样的资料收集成为可能，除了归功于先进的收集手段外，资料的开放程度是非常关键的。倒退若干年，像前面说的拍照，英国人就不会允许你干。这就说明，除了硬件先进之外，软件，也就是人的观念，是更为重要的东西。

华先生在他的报告里，就这方面着重讲了四点：

一、要有一颗踏实做研究的心。没有这种心理状态，没有这种追求，其他研究的事情都谈不上。

二、信息共享。信息共享的观念是资料研究手段进步的基础。内容再好的资料，收集用的手段再先进，拥有资料的人不肯拿出来共享，也是白搭。英国伦敦外环线（M25）以内各大学的图书馆，是资料共享的。华先生在美国杜鲁门图书馆做研究时，图书馆可以通过互借系统替他借到美国国内其他图书馆收藏的书。各文献收藏点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介绍他们的收藏，询问研究者的需要，尽量给以满足。我们国内不少收藏点的同志可能就会觉得事情越少越好。美国有《信息自由法案》，学者可以根据这个法要求提供不是特别涉密的资料信息。我们国内有的研究者满足于信息内部享用，奇货可居，用档案

材料写文章而不把档案给别人用。学者之间信息共享有什么不好呢？80年代时华先生从英国复印来了六百页文件，一个兄弟所希望共享，华先生就让他们全部复印了。

三、学术伦理。2009年12月24日，也就是圣诞前一天，国内一个知名网站发表了一篇文章，据说是原来发表在一家知名出版社出版的2004年中国讲座的书上。文章是给一宗1946年圣诞节在北京发生的案件翻案的。当时两个美国兵在东单附近强奸了一个中国女大学生，由美国军事法庭确认有罪，判刑后赴美国服刑。到美国后，由官方做主，把案子翻了过来，罪犯恢复了军职。在中国，此案掀起轩然大波，国统区50万学生罢课反美，成为中国革命高潮中的一个重大事件。翻案文章自称以某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手中握有的美国档案材料为据，指名道姓说此案是“毫无强暴痕迹的‘强奸’”。而且剑指中共，说它如何将个案变成了公众事件。华先生对出现这样的文章感到悲愤。原因之一是华先生在美国海军部亲自看过此案的美国档案，跟翻案文章所说完全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1986年，华先生委托杜鲁门图书馆帮助找到此案美国官方文件的下落。图书馆查明，该档案原属美国海军军法处（Naval Judge Advocate）管，存在国家档案馆在苏特兰的库里。应杜鲁门图书馆的要求，档案已经调到华盛顿海军军法处，允许华先生到军法处去查阅。华先生去军法处查了档案，其结果已经在《从雅尔塔到板门店》（1992和2006年中文版，1993年英文版）上发表。且不说此案据中方的档案所载，早已是铁证如山，美方的档案所载是同样的。其真相是，当时在北京的美国军事法庭有两名法官曾提出对两名罪犯宽大处理，但是判决书说，“判刑之轻已经使得不能再宽大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加强师师长在1947年2月21日签字批准了法庭给主犯15年徒刑的判决，罪犯被送回美国服刑。很快，美国官方就着手翻这个案。但是美国海军复查委员会不同意给翻，它在1947年7月8日报告说：“本委员会经慎重复查……一致认为证据已足以支持法庭对强奸一罪的判决。因此，建议海军部长对审判程序，第一项罪行的证据、判决以及裁定予以批准。”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司法独立不过是一句空话，案照样翻过来了。感到悲愤的原因之二是翻案文章对受害者指名道姓，用词轻蔑。要知道，受害者迄今在世，有家庭子女，她要在社会上生活。华先生在写书时，不但没有提受害者的名字，而且也没有提罪犯的名字，因为考虑到对当事人的影响。当年的罪犯如今可能也有家庭子女，其犯罪固然自身要负责，但是如果没有美国政府错误的对华政策，他在没有犯罪前早就回国去了。难道做学者就可以这样随便拿人说事吗？没有学术伦理来管资料的真实性，来管文字的社会影响，其结果就是乱套。

四、与此相关联，华先生认为有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不管你信奉什么主义，做学问总得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管你身在哪里，做人总得有点中国人的骨气。听说有的老师指责学生被毛泽东思想洗了脑。毛泽东思想怎么了？华先生举了个例子，解放战争用算术的办法算出蒋介石共有多少个旅的军队，消灭他多少个旅和多久之后就能逼他转为战略防守，再消灭他多少个旅和多长时间之后，就能解放全中国。战事果然就照这样发展而且提前实现了。试问，世界上有哪个战略家有过这样的本事？再说，脑子是能洗的吗？华先生说他从小学英文，看美国电影，唱美国歌曲，读美国小说，在美国教会办的学校念书，现在还在不断看美国人写的书和美国电视连续剧，他今年快八十岁了，美国人也没能把他的脑洗了。华先生和他的不少同代人对毛泽东思想，不是被洗脑，而是主动追求，生怕学不会。华先生倒是对自己有个要求，因为个人的专业涉及美国，面

对强势文化、强势政治、强势军事和强势经济，人家掌握了国际硬通货发行权、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库和方方面面的话语权，他告诉自己得随时警惕，要注意加强祖国文化的修养，要在两个国家利益发生分歧的时候，不做汉奸。从古到今，挟洋自重都没有好下场。

在华先生报告后，与会人员就档案收集、学术伦理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自由讨论。

## 华庆昭先生在南开大学讲学

宋 丹

2010年3月13日，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华庆昭先生应邀来到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为广大师生做了题为“学习历史的快乐和迷茫”的讲座。赵学功教授主持了这次讲座，部分相关专业的教师参加了讲座。

华庆昭先生根据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和广博的阅历，主要从三个方面讲述了自己研究历史尤其是美国史的心得体会。首先，华先生强调多方面的知识积累对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老先生认为要想在历史研究中真正做出成绩，必须了解历史书籍之外的许多东西，比如说文学、地理、艺术等知识，这些可以通过闲暇时间看看小说、听听广播、翻翻地图等多种渠道获得。其次，华先生提醒我们做美国史研究必须摆正自己的立场。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要以中国人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而不能成为外国思想文化的俘虏，这是研究一个强势国家历史所必须警惕的陷阱。最后，华先生谈到了研究美国史的学者非常关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学好英语的问题。老先生针对目前英语学习存在的“费时多，收获少”的问题，建议我们通过多读英文书的方式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并强调了用英文写作的重要性。

华庆昭先生富有见地的观点和看法以及风趣的表达，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讲座的后半部分，同学们就相关问题踊跃提问。华先生耐心详细地解答了这些问题，并希望同学们能继续坚持踏踏实实地读书、扎扎实实地做学问的良好传统，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成绩。老先生的殷殷教诲使同学们受益匪浅，同时也坚定了投身历史、做出一番成绩的决心。

## 康奈尔大学陈兼教授在北京大学讲学

乌兰初稿，牛大勇、王希、王立新修订

2010年3月30日下午，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陈兼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发表题为“以革命的名义：关于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的再思考”的演讲。演讲由王希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牛大勇教授和王立新教授对演讲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陈兼教授的报告以他的第一本英文专著《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冲突的形成》(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94)为切入点,综述了他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的分析,并由此展开讨论了1949年的中国革命对冷战乃至当今中国发展的历史意义。陈兼认为,关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国内以往的研究多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强调中国被迫参加朝鲜战争,而国际学术界也将中国参加朝鲜战争视为国际冷战的大环境所迫的举措。美国学者采用的“失去中国论”和“失去机会论”等也是以美国为中心来思考。在陈兼看来,这些研究忽视了中国领导人对于参加朝鲜战争的逻辑思维和正当动机。他通过列举朝鲜战争前后的一些重要史实,认为参加朝鲜战争是中国方面的主动选择,并非迫于苏联的压力,而做出这一抉择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对中国革命的宏大任务及巩固新政权的合法性的思考有着密切的关联。陈兼认为,1949年开创的革命国家,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的信心,绝大多数人民的衷心拥戴令他们感到政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存在。在毛泽东及其战友的眼中,1949年的革命不光具有重大的历史正当性,而且肩负极为宏大的任务,革命不光是要创造一个不再受到列强欺辱的新中国,还要向现存的以强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权力分配体系进行挑战,为中国赢得一个长久的安全的发展空间。出兵朝鲜的决定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这种对未来国家和国际秩序的“理性思考”,而正是因为中国出兵朝鲜的决定和中美在朝鲜战争中的不分胜负的结局使得美国意识到中国决策的“理性”所在并重新评估新中国在冷战中的位置。陈兼认为,在中国对外政策史的发展过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朝鲜战争对于自己国本之所在及其合法性的界定,都是一个里程碑的事件。它对于中美关系、美国对华政策、中苏关系、冷战的定性和走向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意义。

陈兼教授同时提到,他的专著自1994年出版以来之所以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得益于这本书生逢其时。一方面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大量新史料(尤其是中国方面史料)的出现;另一方面是冷战结束的方式打破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旧定义,新冷战史研究的兴起使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他的研究则是从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自立等问题考虑出发,探寻出兵朝鲜决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根源。

牛大勇教授在评论中,赞同陈兼教授对朝鲜战争起因与后果的分析,但强调人类历史的发展充满着可选择性,要避免历史宿命论。从史实角度看,当美军越过三八线时,中国革命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是不赞成出兵朝鲜的,所以毛泽东的选择未必是唯一的具有革命正当性的选择,绝大多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倾向不出兵,也是具有革命正当性的选择。更何况历史的实践早已证明,“以革命的名义”所做的一切,未必都是正当的。陈教授关于战争起因与后果的分析,同其出兵具有唯一正当性的论点是有矛盾的。陈教授回应说,不出兵当然是一个选择,但对毛泽东来说出兵朝鲜却是唯一的选择。

王立新教授从方法论角度发表了评论。他认为,陈兼从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来解释中国出兵朝鲜的原因,把中国参战视为新中国领导人主动选择的结果,其解释打破了以往的“美国中心论”,富有新意。他同时认为,陈教授挑战了过去专注于国家安全因素的物质主义解释,从文化的视角,把中国参战置于近代中国历史脉络和世界革命史两个框架之中加以理解,视野广阔,富有启发性。在讨论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激发的民族主义

在中国的深远影响以及合法性问题时，针对陈兼教授对民族和民族性的强调，王立新教授指出，在当代中国正在崛起和民族复兴前景在望的情境之下，应更多地强调全球和个人，而淡化民族和国家，通过对个人权利的珍视和保护来重塑合法性。陈兼教授表示，他不反对强调个人权利和全球利益，但在目前还不能脱离民族和民族国家来谈个人与全球利益，但他并不是说要回到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去。

参加讲座的有来自各院系和兄弟院校的师生有 70 多人。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就朝鲜战争的史实、冷战理论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次革命对当前中国的意义等提出问题或发表评论，陈教授也作了简要回答。最后，王希教授在总结中指出，陈兼教授在一个“去革命的时代”讨论“革命”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有助于帮助我们重新思考中国革命（包括自 1840 年代以来的历次革命）的本质、遗产和相关性，并在这个背景下检讨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以及维系两者的历史基础。

短短的两个多小时，陈兼教授的精彩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他以广阔的视野、幽默风趣的语言给在场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在南开大学讲学

贺建涛 张献华

2010 年 7 月 9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沈志华教授应邀访问了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并做了题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决策失误”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江沛教授主持，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学功教授、历史学院王黎副教授等近百名师生参加了讲座。

在近三个小时的讲座中，沈教授首先从美俄两国最新解密的档案以及中国相关重要文献出发，简要阐述了朝鲜战争爆发的背景、美苏的战略意图，指出中国出兵朝鲜是中国共产党基于当时国际局势分析判断的必然选择。沈教授认为，战争爆发后美国和苏中对双方的战略意图都有误判，美国认为中国不可能出兵，苏联和中国也没有料到美国仁川登陆后会越过三八线。

沈教授重点阐释了中国出兵之后第一次战役到第三次战役战场形势的变化情况，就 1951 年初朝鲜战争中国对停战谈判的立场进行了分析。他认为，1951 年 1 月 13 日，即中国军队取得第三次战役的胜利以后不久，联大政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朝鲜问题三人委员会”在十三国提案基础上提出的关于解决朝鲜问题基本原则的“补充报告”。该报告主张立即实现停火、恢复和平；外国部队分阶段撤出，安排朝鲜人民进行选举；为统一和管理朝鲜做出安排；召开由英、美、苏和中国参加的国际会议，解决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等问题在内的远东会议，这对中国十分有利。面对国际压力，美国被迫表示接受此决议。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次实现停战的绝好机会。如能果断实现朝鲜停战，中国将获得参加战争的最大收益，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美国极为有利。然而，由于错估了战场实际形势等诸多原因，中国丧失了获取战争成果的最好时机，

形势逆转，造成此后外交和军事上的被动，付出了惨重的战争代价。

最后，沈教授与在座师生进行了互动交流，就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的复杂动因、中朝在战争中的关系、战争对中苏关系的影响、印度和英国在调停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回答了师生们的提问。他缜密深刻的思维、幽默睿智的回答博得了听众阵阵掌声。沈教授的讲座加深了我们对朝鲜战争复杂性的认识 and 了解，反响强烈。

## 美国驻上海世博会总代表费乐友先生访问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

李文硕

2010年6月25日下午3点，美国驻上海世博会总代表费乐友(Jose H. Villarreal)先生及夫人在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高来恩(Brian Goldback)等人的陪同下来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美国史研究所，与该所师生举行座谈，40多位老师和研究生出席了座谈会。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周宁教授致欢迎辞，美国史研究所所长王旭教授主持座谈会。美国驻上海世博会总代表费乐友先生介绍了世博会美国馆的情况，并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

周宁院长在致辞中热烈欢迎来访的美国客人，他指出，这一活动将为厦大学子展现一个全方位的美国馆，必定会丰富我们对美国文化的认识。王旭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的基本情况和师资力量，并对费乐友先生及夫人的到来表示欢迎。

费乐友先生是以自愿者的身份出任世博会美国馆总代表的。他曾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并担任过沃尔玛集团的董事，他和妻子都是墨西哥移民后裔，女儿在上海工作。厦门是他离开上海后的第一站。在座谈会上，他介绍了世博会美国馆的基本情况。在向师生展示美国馆图片的时候，他说，美国馆将为观众打开一扇通向美国的大门，这个“美国之旅”由四大展厅串联而成，以故事的形式，通过多媒体展示和互动方式带给游客45分钟的美国文化盛宴。他特别提及了美国馆所体现的多样化的美国文化，介绍了他的家乡——得克萨斯州，并与大家一起分享美国馆举办的各种文化活动。不过他认为最有特色的是在美国馆活跃的“学生大使”们，这些来自美国的学生志愿者作为友好使者，为游客解说美国文化。他个人最喜欢的是美国馆内第一部分的展示，其中能看到许多来自不同地方不同职业的美国普通民众用幽默、有趣的口吻配合中文来表示欢迎的画面。费乐友先生与大家讨论了“美国的多元化和美国馆”，谈到移民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并赞扬了华裔移民为美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还给同学们讲了自己作为墨西哥移民家庭的例子。当他得知厦门大学还有很多师生未去参观世博会时，特别鼓励大家到上海参观展馆，建议不要因为排队时间长而放弃参观，最好在晚上入园参观，错开客流高峰。

随后，费乐友先生回答了在座师生有关世博会美国馆的问题，气氛十分活跃。

## 会员动态

### 李剑鸣教授入选 2009 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近日揭晓的 2009 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特聘教授名单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榜上有名。李剑鸣教授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首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此前王希教授曾于 2004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创立于 1998 年 8 月，由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启动实施，是集选才、引才、奖励、支持四位一体的高层次人才计划，是我国重要的高层次人才计划之一，目的在于延揽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培养造就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带动国家重点建设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包括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岗位制度和长江学者成就奖。

### 王立新教授入选 2009 年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

根据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等七部委《关于公布 2009 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的通知》（国人部发[2009]189 号），我会理事、北京大学历史系王立新教授入选 2009 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是由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举办的人才遴选工程，旨在“努力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注重培养一线的创新人才”。

### 方生顾问向秘书处赠送图书

近日，我会顾问、商务印书馆资深编审方生先生向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赠送了一批图书。方先生长期从事美国史研究和译介工作，曾参与商务印书馆《美国丛书》、《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等书籍的编辑工作，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着美国史研究会的工作和学术交流。这次赠送的图书，主要是关于美国政治和社会的多种名著。

方生先生所赠图书有：

[美]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 1982 年出版

[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 1988 年出版

[法]克罗齐埃：《被封锁的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9 年出版

[美]弗雷德里克·西格尔：《多难的历程——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商务印书馆 1990 年出版

[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3 年出版

[美]科恩：《美国法律文献检索》，商务印书馆 1994 年出版

- [美]伦纳德·西尔克、马克·西尔克：《美国的权势集团》，商务印书馆 1994 年出版  
[英]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商务印书馆 1995 年出版  
[美]柯特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出版  
[美]卡普洛：《美国社会发展趋势》，商务印书馆 1997 年出版  
[英]拉斯基：《我们时代的难题》，商务印书馆 2001 年出版

## 任东来教授在埃默里大学访问

应美国埃默里(Emory)大学 the Claus M. Halle Institute for Global Learning 的邀请，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我会副理事长任东来对埃默里大学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学术访问。在 1 月 25-2 月 5 日的访问期间，艾默里大学校长 James Wagner 和教务长 Early Lewis 分别会见了任东来。Early Lewis 教授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是研究城市史和黑人史专家。在出掌埃默里大学教务之前，他是密西根大学副教务长，作为被告，他直接参与了 2003 年里涉及密西根大学“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两个最高法院案件。在涉及法学院的肯定性行动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以 5 比 4 的票数裁定校方获胜；但在涉及本科生的案件中，最高法院以 6 比 3 的票数推翻了校方对少数族裔学生入学得优惠政策。Lewis 教授很高兴中国学者也关注这些案件，并将自己参与编著的新书 *Defending Diversity: Affirmative Ac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送给任东来作为纪念。

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任东来先后与法学院、政治系和历史系的十五位教授进行了五次座谈，并在政治系 Marry Bullock 教授的中美关系课上，就“中美抗日同盟”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做了两次客座演讲。在交流之余，任东来还在“卡特总统图书馆”做了三天的研究，搜集有关《与台湾关系法》的文献，并与附属于埃默里大学的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小组就中国小区的自治和物业管理进行了交流。

利用周末，任东来还去了阿拉巴马州的 Auburn 大学，与目前在该校历史系任教的老朋友卞历南叙旧。卞历南是已故的东北师大教授丁则民先生指导的第一批硕士生，与我会理事长王旭教授同学。1986 年赴美留学，后来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目前是该校历史系副教授，北美 20 世纪中国历史学会候任会长。他的博士论文 *The Making of the State Enterprise System in Modern China: the Dynamic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2005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先后有 24 篇肯定性书评。他因此获得 2009 年度 Auburn 大学最高的学术奖励（每年文科、理科各一人）。该书的中译本由卞教授自己翻译，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 高春常教授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访学

受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骨干教师国际合作项目”的资助，我会会员、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高春常教授自今年 2 月 22 日起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和非裔美国人研究所进行期限为半年的访学工作，研究题目是“美国黑人宗教中的恍

惚、幻觉和草药”。Mark M. Smith教授和Daniel C. Littlefield教授分别是高春常教授在该大学上述两个机构的联系人，Francesca J. Fair女士是协调人。2月25日，高教授与Smith教授、Littlefield教授一起参加了著名历史学家Eric Foner教授在Gambrell Hall礼堂举行的关于林肯与奴隶制问题的演讲；3月24-26日，高教授将参加非裔美国人研究所组织的“南卡罗来纳大学与21世纪的非裔美国人研究”研讨会；31日将参加Harris Pastides校长邀请的各国学者招待会；4月在历史系举行两场“大西洋视野中的北美黑奴宗教”讲座。高教授的办公室位于Thomas Cooper图书馆的L250；电子邮件：cgao@mailbox.sc.edu。

## 李莉博士获厦门大学教学竞赛特等奖

我会会员、秘书处秘书，厦门大学美国史研究所李莉博士在厦门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中，荣获文科组特等奖。

## 新书讯

(以作者姓氏笔划为序)

### 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

《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Discovering History in America: Reflections of 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于2010年6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一部由中国旅美历史学者写作的个人回忆编撰而成的文集。书中31位作者早年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出国门,分别前往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攻读历史学,获得史学博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大学任教,获得终身教职,并以扎实而有影响力的学术著述开始在美国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这些作者也积极与中国的历史学界频繁联系,通过讲学、出版等活动,向中国学者和学生传递关于美国史学发展最新动向的信息。独特的历史背景、时代所提供的机遇以及共同的求学经历等,使这些学者构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跨国界、跨文化的学术共同体。在回忆录中,作者们用生动感性的笔调讲述了各自在海外求学、执教、出版学术专著和参与美国大学管理的亲身经历,详细描绘了美国史学研究生的训练过程,比较分析了中美史学研究环境的利弊,从“体制内”的角度对美国的高教体制、大学管理、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做了丰富、细腻和深入的观察。与此同时,本书还对美国史学部分领域的史学传承与发展做了精辟的介绍,并在附录中对中国留美历史学会(*Chinese Histor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及其英文学术期刊(*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的成长经历做了介绍。本书的文字生动活泼,内容丰富感性,叙述深入浅出,读来激人意气,引人深思,是一本集可读性、知识性、史料性和学术性为一体的著作。

## 目录

### 序

“出”与“入” / 巫鸿

惑中做史 / 叶维丽

从边疆到边疆 / 刘晓原

出版的学问与学术的出版 / 李小兵

火的洗礼 / 王希

路漫漫其修远兮——学史人生三十年之回顾 / 张信

历史,你在哪里? / 陈勇

走进多元文化社会——一个历史学人的留美经历与思考 / 李洪山

澳美留学就业记——兼论美国学术出版 / 熊存瑞

西方历史研究的困境与我在美国的学术生涯 / 余茂春

学海无涯,有容乃大——我在美国求学治史的经历 / 翟强

学史之道——兼论史家的“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 / 朱孝远

从“二战史研究”到“冷战史研究”——我从中国到美国学术经历的若干片段 / 陈兼

学而不优则仕——美国大学职业转轨散记 / 洪朝辉  
西方唱盛中国——美国中国学研究中的历史翻案问题 / 卢汉超  
当孔子碰到耶稣——在美国天主教大学执教散记 / 孙绮  
我在美国求学，教学与治学 / 许光秋  
从小镇走向大洋——突破和创新 / 邵勤  
近代中国体育——范畴类别与体制归属 / 王冠华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学历史？——一个圈内人的“圈外话” / 王晴佳  
求学治史，感悟人生 / 萧知纬  
从手指湖到落基山——我的导师和我的学史历程 / 田宪生  
在美国发现第三种历史——从“本历史”到“它历史”再到“大历史” / 魏楚雄  
浮生三记 / 徐国琦  
大洋两岸史海探寻杂感 / 杨志国  
求史三记 / 姚平  
充当中美学术间的“二道贩子” / 王笛  
他山寻石，攻玉以理——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求学记 / 丛小平  
游学北美十八年 / 单富良  
重新认识乡村中国——兼谈我的治学经历 / 李怀印  
在美十二年——我的学术经历 / 夏亚峰

王旭、罗思东著

## 《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

王旭、罗思东著《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于2010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稿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后半期美国的大都市区化与大都市区管理模式”的最终成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美国大都市区地方政府历史的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以后，城市和周边地区的联动发展促成大都市区的一体化发展，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的调整，因而在集中管理与地方自治、民主与效率之间出现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本书稿对此现象进行梳理，并选取某些重点问题深入分析，总结其成败得失，为不同地区对于大都市区经济、社会问题管理模式的选择提供合理的解释和分析。该书是王旭教授策划的“新城市化”丛书之一。

## 王旭等译《全球族：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种族、宗教和民族认同》

王旭等译《全球族：经济全球化大潮中的种族、宗教和民族认同》(*Tribes: How Race, Religion and Identity Determine Succes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by Joel Kotkin), 2010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认为，族群意识可以视为全球经济演进中的决定性

因素之一。本书着力探讨了犹太人、英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印度人等五个群体，认为他们具有强烈的族裔认同感和共同依存意识，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变化中从善如流，表面上似乎是分散而居的，但其网络遍布全球，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化部族，因此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范围经济体系中大获成功。本书作者乔尔·科特金，是“新美国基金会”欧文高级研究员，也是名牌媒体炙手可热的专栏作家，在未来学、民族学和城市问题等研究领域受到各国广泛关注，颇具权威性，其著作往往甫一面世，即成经典书热卖。其新著《全球城市史》（2006年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王旭等译）成为学术类畅销书，一度传为我国出版界的佳话。参加此书翻译的还有：李莉、苏宁、王田。

## 王旭等译《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

王旭等译《出租车：纽约市出租车司机社会史》(*Taxi: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Cabdriver*, by Graham Hodges) 于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全方位地为我们展示了近百年来纽约市出租车司机及其社会群体的历史，内容涉及出租车行业的总体变化，出租车司机队伍的构成及其内部矛盾，种族关系对出租车行业的影响，现实生活中的出租车司机与媒体中描述的联系与区别，出租车司机的美国梦与障碍。可以看出，出租车行业的变化与时代结合得极其紧密，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透视纽约劳工史、纽约种族关系史、纽约公共交通史或广义上的纽约社会史。参加此书翻译的还有：刘敏、康丽颖、郭巧华。

## 王恩铭著《美国社会文化》(英文版)

我会会员、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恩铭的新著《美国社会文化》(英文版)于2010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旨在为中国的美国文化爱好者提供一幅以美国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为主线、以美国民族特性和行为方式为内容、以美国社会结构和地区特色为衬托的“美国社会文化全景图”。全书由十五个章节组成，涉及民族性、宗教、价值观、信条、区域文化、流行文化、大众媒体、家庭婚姻、商业文明、教育理念、社会服务和美国国民性等方面的内容。

## 王书丽著《政府干预与1865-1935年间的美国经济转型》

我会会员、鲁东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王书丽副教授新著《政府干预与1865-1935年间的美国经济转型》于2009年11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共21万字。

## 付成双、张聚国和丁见民著《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

由我会会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付成双、张聚国和丁见民等撰写的《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李剑鸣教授策划）于2010年3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北大历史系钱承旦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科研项目“世界现代化模式研究”的成果之一，是钱承旦教授任总主编的《世界现代化历程》系列丛书（10卷本）的组成部分。全书共41万字。

## 《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

我会顾问、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的口述自传于2010年5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由刘绪贻先生口述和审定、《长江日报》记者余坦坦记录、整理，2010年3月首次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这本口述自传是一个动荡世纪的个人记忆。平静严密的文字下面是历史变幻的波澜与社会、民族、群体、家族及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奋斗、求索的人生轨迹如映画展开，大量现代中国的文化名人、政界名人的身影、性格、事迹都在此浮现，各种理想、主义和政治、观念的冲突，也披露笔端，一个更真实的现代文化生态让人感慨低回不已。

### 目录

序言 叶笃正

前言 刘绪贻

### 第一章 家世

- 一、黄陂县与罗家冲
- 二、我们刘家来自江西
- 三、罗家冲的刘家
- 四、养育我成长的家庭
- 五、16岁前家居环境、家屋结构和家庭生计

### 第二章 半耕半读的童年

- 一、生而具有的优势地位
- 二、初受学校教育
- 三、么舅妈
- 四、第二次随父读书及其他三次短期就学
- 五、在与时小学的经历
- 六、从非正规教育中学得的一些知识
- 七、藐视权势同情农民

### 第三章 初中时代：雏燕学飞

- 一、绛帐春风熏我这棵幼苗茁壮成长
- 二、一群益友

- 三、初恋
- 四、爱国活动和我的思想感情
- 第四章 高中时代：炼狱
  - 一、湖北省立高级中学的两种办学方针
  - 二、我在省高的学习
  - 三、省高校友
  - 四、高中毕业后的困境和思想斗争
  - 五、开始刻骨铭心的恋爱
- 第五章 进出南京军需学校
  - 一、进入南京军需学校
  - 二、前途与爱情的矛盾
  - 三、离开军需学校
  - 四、准备投考清华大学公费生
  - 五、我对清华大学与武汉大学高考试题的比较
  - 六、告别周世英上清华
- 第六章 清华园里：大好年华近于虚度
  - 一、对北平的最初印象
  - 二、初进清华园
  - 三、清华大学优越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 四、清华大学的培养目标
  - 五、1936-1937 学年清华园的学生运动
  - 六、大好年华近于虚度
- 第七章 珞珈山上：摸着石头过河
  - 一、为了爱情，为了生存
  - 二、在武汉大学外文系借读
  - 三、回家过春节
  - 四、回到清华大学(或西南联合大学)复学
- 第八章 心系国运守寒窗
  - 一、西南联合大学的办学精神与奇迹
  - 二、在蒙自分校继续读外文系
  - 三、转人心仪已久的社会学系
  - 四、毕业论文：《呈贡水利纠纷》
- 第九章 忆西南联合大学师友
  - 一、重视实证研究、胸襟开阔的陈达教授
  - 二、博学、济世、宽容、风趣的社会学家潘光旦
  - 三、忆先师吴文藻和师母谢冰心
  - 四、天助自助者——忆费孝通师
- 第十章 忆西南联合大学师友(续)
  - 五、我所知道的吴宓教授

六、“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冯友兰教授

七、其他名师众生相

八、同窗故事

#### 第十一章 陪都岁月：撞“南墙”

一、带着遗憾与希望到重庆

二、新婚生活

三、在社会部社会福利司劳工福利科

四、在工矿调整处

五、考取留美自费生

#### 第十二章 硝烟弥漫闯花旗

一、天上掉下来的一点馅饼屑

二、满街神牛八双牙筷

三、见证了下流、偏见、恶意的并不愉快的航程

四、既是天堂，也是地狱

五、关于美国的法治

六、短程的朋友

#### 第十三章 芝加哥大学的学习与生活

一、适应期

二、战胜美国汉学家获硕士学位

三、师友情

四、“发乎情，止乎礼义”

五、震惊世界的学生杀人犯

六、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日子

#### 第十四章 留美观感：中美社会、文化之比较

一、美国的政治体制有值得参考之处

二、美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那样发达

三、美国人尊重人的自然之性

四、美国人的富贵之道

五、美国的扩张主义

后记 余坦坦

李剑鸣、杨令侠主编

## 《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

由我会会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剑鸣教授和我会会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令侠教授共同主编的《美国历史的多重面相——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于2010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系为庆贺历史学家张友伦教授八十寿辰而编的美国史论文集，作者全部是张友伦教授指导过的硕、博士研究生，目前多为国内美国史学界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有的已在美国大学执教。本书内容涵盖美国政治史、社会史、外交史、妇女史和文化史，时间跨度从殖民地时期直到本世纪初期。它们是作者多年研究的心血结晶，材料翔实，立论精审，对美国历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美国历史的复杂面相。

## 任东来、胡晓进合作翻译的两部美国最高法院著作

2010年1月，由我会会员胡晓进翻译、我会副理事长任东来教授审校并作序的《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戴维·奥布赖恩（David M. O'Brien）是当今美国声名卓著的美国最高法院研究专家，弗吉尼亚大学政府与外交学讲座教授，曾深入美国最高法院担任司法研究员和研究助理。《风暴眼》一书共六章，从最高法院与美国政治、大法官的选任、最高法院内的政治斗争、最高法院的选案程序、大法官们如何判案、最高法院与美国人的生活等方面，论述了最高法院的政治特性。在作者眼中，最高法院不再是“最不危险的部门”，而是深陷塑造美国政治与社会的权力斗争之中，成为政治争议的“风暴眼”。《风暴眼》以其卓越的研究水准、小说般的行文风格、生动的内幕花絮和老练的政治眼光，成为了解美国最高法院及美国政治生活的经典佳作。

同月，由胡晓进翻译，任东来教授、任裕海副教授共同审校的《反对有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著名异议》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马伯里案、斯科特案、普莱西案、洛克纳案、布朗诉案、格里斯沃尔德案、劳伦斯案等重大案件中，大法官们发表的不同意见（异议）。编者介绍了每件案子的来龙去脉，以及异议所体现出的不同宪法解释路径与司法理念。这是美国最高法院著名案例的异议第一次编辑成册，为我们认识美国最高法院及其释宪方式，提供了全新视角。《反对有理》的编者马克·图什内特（Mark Tushnet），系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著述丰硕，在美国宪政理论、宪政史、比较宪法等领域颇有影响，是人民宪政观（Popular Constitutionalism）的倡导者和代表性人物。

## 向荣主编《西方国家历史学本科教学调研——以英、法、美三国为例》

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向荣教授主编的《西方国家历史学本科教学调研——以英、法、美三国为例》于2010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肇始于18、19世纪的德国,19世纪后期波及欧美其他主要国家。中国大学的历史教育是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开始的,到今天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何更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历史学教育是当前的重要任务,而西方国家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鉴于此,本书选取高等教育最发达的英、法、美三国进行调查研究,着重考察了这些国家历史学科的沿革和概况、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师资队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手段、评估和考核体系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等方面,并通过电子邮件和访谈的形式进行了采访。全书共28万字,是向荣教授主持的湖北省教改项目“西方主要国家历史本科教学研究”的结项成果。

## 陈海宏著《欧陆烽烟——五百年欧洲陆战的演进》

山东师大陈海宏教授的新著《欧陆烽烟——五百年欧洲陆战的演进》已于2010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共约20万字,是钱乘旦策划的《未名外国史丛书》之一。该书聚焦了1500至2000年这短短500年间的欧洲战争。该书介绍战争不求面面俱到,而是以战争武器装备的革命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战争形式变化为主轴,从“物”的层面勾联出500年欧战的另一种轮廓和图景。该书主要是把丰富多彩的战争画卷作全景式的描绘,采用时空纵横交错的方法,择取生动有趣的战争史料,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许多珍贵的图片将这一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做到了图文并茂、雅俗共赏,使之在欣赏之余能增加对军事知识的了解。

## 周祥森著《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

我会会员、《史学月刊》编审周祥森新著《反映与建构——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于2010年3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所谓历史认识论,是研究现实的历史认识运动及其结果,探讨历史认识运动机制与运动秩序,揭示历史认识的本质与性质,发现历史认识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本书是一部系统介绍和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历史认识论科学领域内的研究成果的著作。就叙述体制而言,本书是以范畴为叙述单元、以述介为基础、以论衡为主导的当代新学案体——论域型学案体;就研究方法与性质而言,具有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哲学与历史科学——的性质,是二者的辩证统一体和合体,表达了作者对历史认识论科学的理论体系的认识。全书共35万字,是李振宏教授主编的“新中国学案丛书”的组成部分。

## 周莉萍著《美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20—1939）》

我会会员、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周莉萍副教授新著《美国妇女与妇女运动（1920—1939）》于2009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40万字，在国内外研究基础上，把美国女性群体放在繁荣—萧条—复苏的背景下，运用社会学、历史学、妇女学等研究方法，并从社会性别研究角度对女性就业、婚姻家庭、教育和妇女运动与组织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的分析。除导言和结语外，本书分三章，分别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妇女生存状况与地位和角色的改变，以及美国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的生存状况和地位变化，比较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1920—1940这个时期美国女性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中生活状况和地位及角色的变迁。

## 郑春生著《拯救与批判——马尔库塞与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

我会会员、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郑春生副教授新作《拯救与批判——马尔库塞与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于2009年6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本书立足于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大背景，通过文献分析的方法研究一个著名的思想家——马尔库塞和一场伟大的运动——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之间、即社会理论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全书共30万字，主要从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社会大背景、马尔库塞思想与学生运动宣言纲领之间的文本联系、马尔库塞与学生运动事件上的联系、媒体对马尔库塞“学生运动精神领袖”地位的建构等方面阐述二者间的关系。

## 满运龙、陈勇和杨玉圣编《美国史探研（续编）》

由满运龙、陈勇和杨玉圣编的《美国史探研（续编）》于2010年3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为庆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而编，收录齐教授及其弟子、其弟子培养的学生、北大同事和学术同仁的40余篇文章。全书共93.5万字。

## 秘书处近期工作

### 一、增加秘书处工作人员

年会结束之后，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秘书处进行了人员分工的调整，增加了新的人手。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两名硕士研究生李文硕和王宇翔承担了邮件收发和网站更新等工作。《通讯》的编辑队伍进一步增强，李莉、杨长云、曹升生等成为新的编辑人员。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可以进一步提升秘书处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 二、纪念我会顾问杨生茂教授

5月4日晚得到杨生茂先生病逝的消息后，秘书处当即向所有会员发送电子邮件通知此事。随后在研究会网站设纪念专栏，征集并刊登纪念杨先生的文章。与此同时，秘书处广为搜集关于杨先生的报道，第一时间在研究会网站转载，使广大会员尽快、尽可能多地得到纪念活动的信息。截至8月20日专栏的信息达到88篇，其中研究会网站原创信息41篇。秘书处在纪念杨生茂先生活动中反应迅速，很好地起到了联系广大会员的纽带作用，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 三、庆贺我会顾问黄绍湘研究员、齐文颖教授寿辰

为了庆祝我会顾问黄绍湘研究员九十五寿辰、齐文颖教授八十寿辰，秘书处分别发去了贺信，并在通讯和网站进行报道。

### 四、更新会员信息

研究会网站设有会员信息栏目，刊登的是我会会员的个人信息。由于个人信息经常发生变动，有必要进行更新。秘书处通过电子邮件向会员发送了通知，截至8月20日收到更新信息130条。秘书处陆续将会员的新信息上网。这里要提醒各位会员，如果您的个人信息（特别是电子邮件）有变化，请及时通知秘书处，我们会尽快更新您的信息。

### 五、启用新的邮箱

电子邮件是秘书处与会员联系的最重要的渠道。秘书处过去使用的厦门大学邮箱容量已经达到极限，为了便于今后工作的开展，经多方咨询，我们启用了容量最大、操作方便的gmail邮箱。使用新的邮箱不仅需要将所有会员的电子邮件地址导入，更麻烦的是会出现联络的中断，有的邮箱可能会把我们发送的邮件当成垃圾邮件加以拦截。因此，我们要求收到邮件的会员进行回复，以确保联络的通畅。新的邮箱启用已经两个多月，还有很多会员没有进行回复。如果您没有收到秘书处gmail邮箱发出的邮件，烦请发邮件或者写信、打电话、发短信告知。

秘书处在gmail邮箱设置了自动回复，也就是说，如果您发出的信寄达，邮箱就会自动发出邮件告知，我们也根据要求进行人工回复确认。在邮箱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会员发给我们的信件都会收到回复，如果您没有收到回复，请再次尝试发送，或者用其他邮

箱发送，或者用其他渠道通知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发去的邮件有可能被当成了垃圾邮件，请在您的邮件垃圾查找，把秘书处的邮件从里面挑拣出来，并放到白名单中。虽然使用新的电子邮件信箱产生了诸多问题，其快速便捷、成本低廉的优势不可替代，我们恳请各位理解并配合秘书处的工作，这样才能确保秘书处与广大会员通讯联络的畅达。

---

有会员曾提议“研究会的邮件地址可否不再用跟中国政府作对的 GOOGLE”，由于秘书处已经告知了全体会员，并进行了多次联络，如果再做更改，会再次影响秘书处与会员之间的联络，所以无法进行变更，特此致歉。

## 编后记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 2010 年 4 月 23 日至 26 日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本届年会共征集论文 110 多篇，参会代表达到 130 多名，是历届美国史年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感谢广大会员的积极参与！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研究会的老一辈对此次年会的鼎力支持。九十七岁高龄的刘绪贻顾问不仅写来贺信，而且提交论文（将于下期通讯刊出），黄安年顾问虽然因故未能出席年会，也发来了贺信和论文。黄柯可顾问尽管身体状况欠佳，还是亲自与会并在开幕式上精彩致辞，而且坚持自己承担往返路费，让我们深为感动。方生顾问给秘书处寄来一批图书以示庆贺，老会员杨立文先生专门寄来会费 300 元。借此机会我们向老一辈会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他们身体健康！

年会之后，王希顾问给我们发来一封长信，对年会的组织工作等问题提出了详细的意见，黄安年顾问、任东来副理事长和一些会员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对研究会工作有很大的帮助，CINFO-现代信息公司的国以群先生再次对我会的年会慷慨襄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届年会顺利完成了理事会的换届工作，产生了以王旭教授为理事长的第十一届理事会。前任理事长李剑鸣教授 1990 年开始担任研究会副秘书长，迄今为研究会服务二十余载。研究会的发展壮大，凝聚着他的心血和汗水，秘书处代表全体会员对李剑鸣教授表示深深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此次年会的理事会对《通讯》的发行工作达成一致意见：鉴于研究生会员地址变更不定，今后只向研究生会员发送电子版《通讯》，不再邮寄纸本《通讯》（如果确实有需要请向秘书处索取），同时决定免去研究生会员的会费。

年会之后秘书处更换了新的信箱（[ahrachina@gmail.com](mailto:ahrachina@gmail.com)），并进行了会员信息更新的工作。如果您没有收到秘书处发出的邮件，请尽快与我们联系。

2010 年 5 月 4 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南开大学杨生茂教授在天津逝世。杨生茂先生逝世后，我会会员撰写了许多纪念文章，目前南开大学正在对这些文章进行编辑。编辑结束后，研究会将印制纪念杨先生的《通讯》专刊，敬请关注。